

故國之內・國境之外

——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傳統文人的 西渡經驗初探*

曾巧雲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針對日治初期台灣漢文知識分子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西渡詩文進行爬梳：從移動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條件的掌握，到《臺灣日日新報》上支那論述形塑的觀看支那視角，以及出發前的西渡送別詩文中投注的故國想像。從出發之前到啟程、回返之後其移動視線的流動與聚焦所在進行文本分析。筆者發現在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漢文西渡遊記，其移動背後的複雜程度或許遠遠超過故國遺民之思，其背後更鑲嵌了帝國在南支的空間擴張以及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文化身分地理界限的變動。

隨著乙未割台，殖民地做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不管是對內或是對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的重劃，而做為台灣傳統知識分子也同時經歷了空間與界限的改造與內外的重組。因此在其西渡遊記詩文當中，筆者看到的是這個最早迎受殖民地統治與近代化歷程的世代，在其西渡的移動過程中，在其目光來回梭巡之際，既折服於帝國展示的文明圖景，又失望於故國的動盪衰敗，同時又感受到台灣人身分的曖昧性。透過其旅行視線的交錯，筆者在其西渡中國的移動路徑上，看到比故國情懷更為複雜曖昧的文化身分地理的變動：他們一方

* 感謝本次匿名審查人點出本論文的核心問題並提供寶貴懇切的修改意見，在此由衷表達謝忱。

面在東亞論以及日支提攜親善政策中找到介入點，縫合因割讓而斷裂的文化身分與記憶的傷痕。但同時隨著殖民的深化其對於現代性與近代文明渴望，卻也讓他們複製了殖民進步主義的觀看邏輯在其望向故國的視線上。這種夾處於中間的兩面性也造成日後台灣知識分子日趨混雜與曖昧的精神圖像與認同建構。而同時台灣做為一個割讓與殖民現實所構造出來的殖民地空間。也開始提供了其思考與行動的立足點與框架。

關鍵詞：《臺灣日日新報》、台灣漢文知識分子、支那觀、西渡書寫、移動與認同



Inside of the Former Country, Outside of the National Border:

A Study on Taiwan Literati's China Experiences Published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seng Chiao-Yun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ina travel writings and China experiences published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aiwanese mobility to the travel writings of Taiwanese Han-Wen intellectuals before the 1920s in colonial Taiwan, the paper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changes of their viewpoints of China,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border. Through their visions of former country and mobility paths to China, the Taiwanese Han-Wen intellectuals' travel writings reveal not merely the nostalgia of motherland but also the emergence of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after 1895, Taiwan as a colony space and base for Japanese southward adventure has to redraw i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border line and spac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encounter the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also have to face and react to the violent change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tracing their boundary-cross paths and vision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ir desir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disappointment for China's weakness, and ambiguous identity. The emergence of in-between-ness causes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complicated identity and

the Taiwan-based thinking through the colonial space constituted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Keywords: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Taiwanese Han-Wen Intellectuals, Shina-Kan (View of China), China Travel Writings, Mobility & Identity



故國之內・國境之外

——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傳統文人的 西渡經驗初探

一、前言

台灣處於日本與支那兩團火之間——矢內原忠雄¹

1895年，台灣被清朝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就被迫拋入一個既是斷裂又是跨越的歷史語境中。而在此同時，作為一個新興帝國治理下的殖民地台灣，除了開始被繪製編寫入帝國的地圖與歷史敘事當中重新空間化之外，也開始進行殖民地空間的重塑以及景觀的改建。隨著帝國的日漸擴張，不管是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都同時感受到移動空間的變化以及延伸。如果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日本殖民統治的50年，同時是兩個碩大的他者「日本」、「中國」同時介入到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同時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性的源頭。南韓學者金艾琳²在解讀三澤真美惠分析抗戰導演何非光的論文中指出：「相較於殖民地朝鮮在身分建構上陷入在『日本人化』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結構性困境，殖民地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建構則更為複雜深沉，除了日本之外更「延伸至中國這一個地形學空間」，「通過進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界限來形成自我身分」。這點或許可以從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雙軌的移動經驗切入來觀察。過去在討論日治時期旅遊書寫或是移動經驗的討論，多半集中在台灣新知識分子的留學經驗及其旅居書

1 若林正文，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2007.03），頁251。轉引自矢內原忠雄語。

2 韓國台灣比較文化研究會，《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3），頁xxx與頁36。

寫，³或是聚焦於帶有東方主義視線與異國情調想像的帝國旅行者或移民者的研究，⁴或是以單一的傳統文人及其旅遊作品⁵作為討論對象而較少全面關照到台灣傳統文人的日本與中國經驗。筆者想知道是否從割台改隸之初，這種移動經驗其實就早已發生，而這種空間上的移動是否是造成了日後台灣知識分子日趨曖昧混雜的精神圖像與認同建構。要解答上述的疑問可能必須先回答下列的問題：是誰在旅行？往哪個方向的旅行？是在怎樣的背景與動機下出發的旅行？又是如何與在移動過程中遭遇的異地景觀與文化進行轉譯與協商？而透過文本的生產，呈現出來的又是怎樣的地域想像與知識建構？

而要觀察日治初期這樣雙軌的移動經驗，可以從傳統漢文知識分子的東遊與西渡兩種書寫切入，筆者在〈往返之間：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東遊經驗初探〉⁶一文中曾針對日治初期的傳統文人的移動經驗提出了問題意識與討論框架。除了界定1920年代以前台灣漢文知識階層在當下歷史語境中的角色和定位外，同時也梳理了《臺灣日日新報》⁷上關於東遊的書寫。筆者認為這個跨越乙未裂變的世代，這個以漢文為思考體系的世代，這個最早迎受殖民地統治與近代化歷程的世代，在1920年代以後新式知識分子的成熟與新的語言典律

3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05）當中處理到謝春木與王白淵二人，而針對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則有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6）。或是圍繞劉訥鷗的上海經驗的討論，許秦蓁，《摩登·上海·新感覺——劉訥鷗（1905-1940）》（台北：秀威資訊公司，2008.02）等。

4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09）、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黃舒品，〈帝國觀看下的「台灣」：日本文化人旅遊紀行中的權力論述、地方與性別〉（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5 相關研究可參考，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01）、施懿琳著，〈周定山《一吼劫前集》中的大陸經驗與感時情懷〉，《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04）、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6 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東遊經驗初探——以1920年代以前《臺灣日日新報》的東遊書寫為探討對象〉，「2008年清成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主辦，2008.12）。

7 關於日治初期漢文知識分子的中國經驗，當然也有個別作者遊記與詩文作品，但筆者想要透過一個具有長期流通性、全島性質的近代媒體來觀察日治初期報章的支那觀與西渡文本的互文關係來梳理當中地理界限與文化身分（想像共同體）的挪動乃至變化。因此筆者還是選擇了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來作為這個時期的觀察，不可諱言的是其作為官方機關紙的性質，在觀點上可能有所侷限單一，但作為一個長期性流通性的報紙，在日治初期這個時間區塊上還是有其值得觀察與梳理的價值。

轉移之前，他們其實是介入／涉入日治初期文化與社會再生產的主要參與者。而很少是全然隱遁傷逝的「遺民」，反而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必須加以收編以「裨補統治」的重要力量。但不可諱言的是，這樣的參與一開始就是在一個政治與文化不均衡的權力之下出發的，但他們各自以不同的姿態與位置介入了這個時代的文明想像與文化生產，同時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經驗、互動和遭遇。而觀察日治初期的東遊書寫，可以發現「東遊」的官方派遣性質與特定路線規劃，帶有藉「觀上國之光」以宣揚帝國文明的眼目教化目的。作為話語大量出現在日治初期的「東遊」，是一個特定時代脈絡的語言創造與生產，而很少是個人的旅遊抒懷。文中藉由日治初期台灣士紳階層的東遊書寫切入，論證過去被視為「傳統文人」的漢文知識階層在日治初期其實是當下歷史語境下的行動者（agent），無論如何他們都被迫面臨了一個文明開化的歷史語境並且必須回應。在其東遊書寫中，筆者既看到了這個第一個接觸近代文明的漢文世代，在初遇文明時的震撼與屈服，也看見他們對台灣未來與殖民現實的種種詰問。

而在本文中，延續著前文的思路與架構，筆者想進一步針對日治初期漢文知識分子的西渡書寫進行爬梳。而在這之前，必須先掌握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台灣人是在怎樣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條件下進行西渡，移動的路徑又受到了哪些外在物質環境的限制與制約。

二、西渡的歷史背景

沒有單獨的地方感的活動參與根源，是埋藏在「壯麗的隔離」之中，而是和其他活動參與的根源糾結。每一個外在的身體活動，每一個路徑——計畫的交叉點，將引入連續而永無間斷的經歷的時空之中，是外—內辯證及其密切相關的生命路徑——日常路徑的辯證。⁸

日治初期自李春生的〈東遊六十四隨筆〉開始，「東遊」便作為一個帶有

8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4.06），頁89。

明確指涉性的話語大量出現在日治初期的話語生產當中，除了有關殖民母國文明之光的眼目教化意涵外，同時還指向一條具體的、事先安排好的移動與觀光的路徑。而不同於從殖民地到殖民母國的這條路徑的明確指向性，「西渡」其實在日治初期的書寫當中，並不像「東遊」是個固定的指稱，也未如東遊一樣有一套特定系統的話語生產模式與積累。這條由台灣西渡到中國對岸的這條路徑來得更為曲折隱晦，是一條由許多的分歧與交叉點所交錯構成的移動路徑。此外日治初期伴隨著中國內部政體的變化（從清國到清國革命到民國），以及日本對岸大陸政策與南支南洋政策的變化，這條路徑也有所岔出，既有個人目的的行旅漫遊，也有帝國派遣的旅行團。而要掌握這條路徑的複雜性，首先要釐清日治初期台灣與「隔一衣帶水」的對岸間的關係變化以及當時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其跨國移動的歷史條件。筆者想由以下幾點切入討論，一是旅券制度，二是日治初期官方的南支南進政策，三是日本支那觀的媒體形塑。

（一）帝國的界限：旅券制度

國籍意指著劃界（drawing borders）：劃定人群之間，政府之間、自己人和外人之間的界限。⁹

1895年的乙未割台，作為一個歷史的大變動，既是台灣傳統漢文知識分子被迫脫離一個精神上的安居狀態，同時又是他們意識到「歷史」的時刻。¹⁰除了心理上的感受與衝擊之外，伴隨乙未變局隨之而來的是領土的移轉、疆界的重劃以及近代殖民地法制的展開與帝國秩序的確立。1895年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給予台灣住民國籍選擇權，¹¹台灣總督府於1896年8月頒布「關於台灣住

9 Ayelet Shachar, 陳昭如譯,〈國籍的法律規制與性別不平等——一個歷史觀點的檢視〉（來源：<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13860/1/932413H002030.pdf>），頁6。

10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2），頁14-21。

11 王泰升曾指出「日本帝國對於新獲得的台灣，有別於之前的對待琉球（沖繩），而是將其是為主權國家內一個特別行政區域，實質上即相當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這是台灣成為一個獨自的政治實體的契機，也是跟隨而來的台灣住民『國籍』、自我認同等一連串問題的開始。」，可參考王泰升,〈台灣人民的「國籍」與認同——究竟我是哪一國人或哪裡的人？〉,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12）。

民之國民身分令（台灣住民ニ関スル國民分限令）」5條，規定在1897年（明治30年）5月8日的「居民去就決定日」期限屆滿前可以選擇去留，期滿後未離開者直接取得日本籍，成為日本新領地下的新附民。1896年8月1日，發布「台灣住民戶籍調查規則」。淺野豐美¹²曾指出，不管是國籍選擇權或是戶籍調查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明確區別「清國人」和「本島人」的「限界」。除了確立新領地臣民的地位外，同時區隔了清國人和台灣本島人的身分。

而日治初期的旅券制度的實施，在某個程度上也是為了區隔清國人與本島人的身分界限而設立的，同時，也劃分出一條本國（日本）與外國（清國）的界線。

1897年台灣總督府制訂了「外國行旅券取締規則」來管理「帝國新臣民」的出入境，規定台灣人出國必須申請旅券，但申請前必須由警察機關加以調查旅行目的與身家操行等來決定是否核發。抵達目的地後必須先向領事館報到，同時將旅券交付領事館保管直到返國前。日語中的「旅券」雖相當於今日的「護照」，但在日治時期，旅券對於台灣人的意義卻更接近渡航許可書，是官方管控與限制台灣人出入對岸的濾篩，¹³從申請核發過程到出入查驗都十分嚴格；即使是在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有投函抱怨旅券申請流程之繁雜緩慢與限制，常常耽誤了旅程或是商機：

獨於旅行券一途。雖則極意保護。然或因遲誤相連。緩急未便。故與情有所不洽。每遇行旅相對太息。咸謂請給旅券之難。常因調查未當注意詳察。動輒稽懸數月。乃肯給發。或為乘時貿易。因遲而失其利權。遂至灰心失業。或因急事長行。以誤而傷其大局。不禁裹足傷神。種種苦情。難以枚舉。以此群情嗟怨。莫可訴伸。如斯苦衷。¹⁴

12 淺野豐美，〈台灣住民の国籍選択権と初期臺灣法制〉，《帝國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02），頁30-50。

13 相關研究結果可參考梁華璜，〈日據時臺民赴華之旅券制度〉，《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03）。

14 〈旅行券所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0.11，5版。

尤其1910年代清國革命風潮興起的時候，總督府對於旅券的發放更加慎重。1920年代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渡華留學生的旅券申請也常常受到推遲或是阻礙。因此1920年代出現了以《台灣民報》與台灣民眾黨的新興知識分子如黃呈聰、謝春木等人主導的撤廢旅券運動，主張旅券制度不是對於台民的保護而是制限、是差別待遇。對於商業、求學以及日華親善乃至國民的海外發展都是不便與阻礙。¹⁵但撤廢旅券的目標最終並未實現，總督府僅就手續上稍加簡化改正而已。論者曾指出赴華旅券制度是日本帝國區隔台灣與大陸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殖民統治者絕無廢除之可能。¹⁶

但是另外一方面，擁有旅券的台灣人卻也表示了擁有了日本帝國的保護，除了治外法權外還有免除關稅等特權。¹⁷而當時這些移居在日本帝國之外並擁有日本籍的台灣人被當時日本官方稱之為「台灣籍民」，「台灣籍民」身分的特殊性因而也形構了一條認同的分界線。在領事權制度庇護下的少數台灣籍民以及冒領籍民身分者在對岸經營賭場、鴉片煙館以及妓館等非法勾當，也造成對岸人民對於台灣籍民的印象惡劣，這群人被稱之為台灣呆狗，被中國報界稱之「台匪」。這也建構了某種對於台灣人的刻板印象與歧視而這個刻板印象一直在往後的不同歷史時刻繼續醞釀著¹⁸。

一方面台灣人因為日本國籍而與故國產生了界限，但另外一方面在申請旅券上由於在台日人與本島人的差別待遇又劃分了另一條界限。本文主要的目的

15 關於台灣民眾黨的旅券撤廢運動的具體主張可參考，〈渡華旅券廢止運動：民眾黨發出聲明書並組織宣傳演講隊〉，《台灣民報》，1929.04.21，2版。

16 同註13，頁182。

17 而除了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外，在其他國家也因為日本國籍的身分而與「支那人」的身分有了分殊。例如〈爪哇一斑（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3.13，5版。新聞中所描述的：「爪哇一等車。除一等國民以外。支那人及土人不能乘搭。余嘗於一等列車內。見一支那人悠悠默坐。怪問之。彼蓋台灣籍民。持本邦政府旅行券。故車掌亦不得不目之為日本人也。是時傍觀支那紳士。似有一種不可言喻之欣羨意。蓋彼常憤慨蘭政府之虐待也。」不過在這則新聞中，我們既看見了由於日本國籍的賦予而產生的區別於「支那人」的界限，但從外表上被誤認為支那紳士的台灣籍民卻同時又讓我們看見了這條界限的模糊與曖昧性。

18 除了在五卅運動前後的反日、排日運動中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在後來的中國抗日戰爭中被視為外國人或漢奸、日本間諜外，在戰後二二八事件中將台灣籍民等同台灣浪人的刻板印象與歧視亦延續到戰後的接收與統治。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戴國輝，〈第七章·殖民地的傷痕〉，《戴國輝全集·史學與台灣研究·卷4台灣結與中國結》（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台灣黑幫籍民之研究》（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9.12）

之一便是想觀察日治初期台灣漢文知識分子的西渡經驗中是否也意識到了這條界限的發生以及存在，又是如何地去回應與思考呢？

另外不能不注意到的是，雖然藉由旅券制度劃分出一條本島人（台灣人／新附民）與清國人（中國人／支那人）的界限，同時對台灣人渡航中國施加限制。但另一方面有點吊詭的是，台灣作為日本南支南洋政策的鎖鑰，自日治初期之始就扮演著日本殖民政府在南清經營的日支親善、乃至中日提攜的中介角色也不能忽略。以下便從日治初期的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乃至大正南進期的時代背景做一個梳理。這些都是觀察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的西渡移動經驗不能不放進來的討論框架以及歷史語境。

（二）帝國與移動：日治初期的南支南洋政策

隨著帝國擴張，人的移動以不僅止於鄉鄙——都城、日本本土的界限，更跨越原本的國土疆界，足跡延伸至文化、空間差異更大的新領土「外地」。¹⁹

伴隨著日本帝國的對外擴張，帶來的是殖民地內部與佔領地之間跨區域的橫向移動，不管從日治初期的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後，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朝鮮的併吞乃至對於中國關東州的佔領，或是對於滿洲的侵略乃至日治末期的大東亞共榮圈下的佔領地、淪陷區乃至戰場之間的移動，這些移動軌跡背後都鑲嵌在帝國的地理網絡以及對外政策的脈動之下。

而觀察1920年代以前台灣總督府的對外關係政策大致上橫跨了從明治到大正兩個時期，當中與台灣最具有密切關係的便是在地理位置上最為接近的「南支與南洋」。台灣一方面緊依中國華南，一方面又與東南亞鄰近，因此自明治期就被視為是日本南方的鎖鑰，是日本南方關與（干預）的前衛與跳板。中村

19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薛化元、若林正文、松永正義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12），頁174-175。

孝志²⁰曾將日治時期台灣與南支南洋的關係分成下列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搖籃期，自領台開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此時期南進的重點主要在華南從事文化工作並擴大貿易。而扮演南進基地金融機關的台灣銀行也在此時期陸續在廈門、香港、福州、廣東等華南各地設立分店同時開展對南支南洋的研究調查。第二個時期是南進熱期，從1916年開始到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後為止，此時期是台灣進出華南的最高潮。伴隨著大戰後歐美亞洲市場的疲軟，日製商品市場趁機從華南擴展到南洋。台灣總督府對南支南洋挹注大量各項設施費與航海補助費以及對於台灣銀行、華南銀行及新高銀行等金融機關的補助²¹。第三期是1924年到1936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停滯期，此時期由於世界範圍的經濟不景氣，日本南進熱退燒，轉向默默投入南支南洋的研究調查與人才培育。這個階段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成為南方研究的重心，為日後日本的南侵政策與大東亞戰爭儲備了人力與實力。²²第四期是193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此時期是日本將南進列為國策並高唱進出南方的瘋狂南進時期，將原來的南洋觀念拓展為結合日滿支的大東亞野心。在這個時期作為南進據點的台灣，其重要性更被強調。台灣人被大量動員派遣至日本佔領區工作甚至到戰爭最前線。

上述可以看見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外政策大致上跨越了明治到大正兩個時期，明治時期的南進政策關心的重點是南清的經營，而到了大正南進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中村孝志曾以三本柱歸納此階段的發展重點：即是學校、醫院與報紙等文化事業，企圖透過知識、身體與意識來改變中國對日本的觀念。也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1907年擔任漢文記者的李漢如赴福建創《全閩報》，1911年王少濤前往廈門旭瀛書院擔任教職，1911年台日報漢文記者的魏

20 中村孝志，卞鳳奎、李玉珍譯，〈台灣和「南支・南洋」〉，《臺北文獻》128期（1999.06），頁231-258。

21 對岸南支那航路在明治時期取代英商道格拉斯汽船公司後，大正期除了持續擴充與補助外，還開啟了以台灣為起點的南洋航路，1916年台灣舉辦的勸業共進會與南洋觀光團便是在大正南進期的時代脈絡下發生的。中村孝志著，〈大正南進期與台灣〉，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04），頁1-74。

22 此時期由於滿州國的成立，也有許多台灣人在五族協和的口號下前往尋找工作機會與求學。此部分可參考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運動——在「滿洲」的台灣醫生〉，《台灣史研究》11卷2期（2004.12），頁1-75。

清德擔任官方號召的南清旅遊團隨團記者，²³ 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日中共同經營的博愛醫院擔任醫師。台灣漢文知識分子科舉仕宦之路隨著日本的殖民統治而阻斷，但同時也伴隨著日本的殖民政策與方向卻也提供了不同已往的工作機會與出路。伴隨著日本對外擴張政策的之始，「海外雄飛」就成了跨越新舊知識分子的一個選擇與可能性。

當然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的移動經驗並非完全都如上述所舉的例子與日本南支南進政策緊密相關的，之間當然也有許多個人經驗的行旅，例如連雅堂、洪棄生等人。但是即便是個人的行旅也不能忽略了上述旅券制度的設限以及航路的開拓乃至定期航班的增加帶動起來的旅行網絡，加上官方媒體的宣傳、教育的形塑乃至於明治到大正時期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所形塑的支那觀²⁴。因此，接下來筆者想先就日治初期從清朝故國到民國的轉變之間，台灣人對於對岸故國看法的各種折射來觀察傳統文人此時對於中國想像的轉變及其日趨複雜的面貌。

（三）日本近代支那觀的形塑：從晚清到民國

文學作品不能簡單地視為對某些地區和地點的描述，許多時候是文學作品幫助創造了這些地方，因為人們對不同地方的了解大多通過各種媒介。因此，多數人的了解是在親眼所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²⁵

近代日本的支那觀是做為新興近代文明國家日本自我認同的「他者」而被建構起來的。子安宣邦便指出，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是一個巨大他者的存在。隨著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它必須要求東亞的中華中心的文明論政治構圖的變更重組。透過將逐漸實現近代化的日本與中國進行差異化，日本做為近代國家

23 日治初期的漢文記者李漢如、謝汝銓、林子禎、李逸濤等人都有被外派採訪之經驗。

24 即使是以文化遺民自居的洪棄生在其八洲之旅行前準備中也閱讀參考過日人的中國遊記，可見洪繡著，林文龍編，《八洲遊記》（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3.05），頁229。

25 克朗著，楊淑華等譯，《文化地理學》（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06），頁55。

及其文化獨立自主性才有可能得到確立。²⁶ 另一方面，日本的支那觀又是複製了西方／洋觀看東方／洋的視角，將日本形構為西方近代文明的東方代表者，而將中國定位在停滯與專制的東方想像中。相對於進步、文明、富強的日本，支那則是落後、貧弱與敗北的。日本一方面為了回應對於西方的焦慮，一方面為了形塑近代日本的國民性，藉由站在西方東方主義視角與高度來重新觀看中國重新確立自己面向西方以及亞洲的合法性位置。史書美也指出：

通過創造諸如“支那”（Shina，日本對西方詞“China”的音譯）和“toyoshi”（東洋歷史）等日本現代新詞來代替舊有術語“Chugoku”（中國）和“kangaku”（漢學），日本將自身與中國區分了開來，並進而確立了自己高於中國的優越性；同時這些新詞也幫助日本至少在話語層面上取得了與西方同等的地位。日本對來自西方“支那”一詞的借用取消了暗含在“中國”名稱中的中國中心的涵義，將中國降格為一個落後的、“在時間軸線上次於”日本的國家。²⁷

支那作為否定性他者的種種論述便是在上述的時代語境下在不同文本中被再現形構出來了。尤其是明治維新以來歷經了日清戰爭與日露戰爭的勝利後，對於中國的知識建構與想像不斷地複製再生產最終膨脹為日後侵略與擴張的野心。除了學術上「支那學」作為一個近代學科的成立，透過學術語言持續產製對於支那的再現之外。隨著大正以來近代旅行機制與交通網絡的成熟，「支那」做為一個中國特性負面意涵與「支那情趣」之異國情調的再現與想像又同時透過各種報導與紀行文字在此時被大量論述傳播。²⁸ 同時，在日本戰勝清國與俄國之後，「亞洲」才逐漸成為日本政治與文化想像中需要「提攜」和「連

26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09），頁77-88。

27 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04），頁24。

28 相關研究可參考西原大輔，趙怡譯，《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5.08）。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2）。以及吳光輝，《日本的中國形象》（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06）。

帶」的空間。²⁹這種產生自日本的中國形象，有論者曾指出這不單純只是「他者認識」而已，而同時也束縛了其後中國知識分子自我認識並且構成了其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畫像」，而形成了某種自我與他者的共犯關係，³⁰當中包括了對於西方和日本對於中國的東方主義式的態度不加批判的接受與認同。

而回到殖民地台灣的場域與歷史語境中，日治初期日本的支那觀又如何能在殖民地浸透、作用甚至是變形？而當時台灣傳統知識分子又如何閱讀、接收、回應這樣的一個關於故國、前朝的「支那」形象呢？以下，筆者想先藉由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上的關於支那的敘事切入，觀察支那觀在台灣的翻譯、傳遞與再生產。同時，做為一個殖民地的特殊發聲位置的官方報紙，又是如何將台灣人置放在支那觀論述中「近代日本——停滯支那」的關係架構中，當中又召喚了台灣人的何種認同想像位置以及對於故國的再認識。

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漢文³¹支那論述大致上可以從兩方面切入觀察：一個是從時間上觀察從晚清到民國之間，隨著辛亥革命以及民國的建立，一個代表新興覺醒中國的意象之出現，日本如何回應這個不同於其對晚清落後封建專制的他者形象設定。一個是在論述策略上日本是如何透過今昔對比，將在同一個時空中之支那固著在一個過去的時空中，透過他時化（allochronism）³²的敘事，造成空間上的距離化以及政治上的他者化。而同時，台灣人又被置放在「支那人——日本人」的論述關係架構當中的何種位置呢？

29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30期（2002.12），頁190。

30 劉建輝，〈產生自日本的中國「自畫像」〉，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03），頁83-104。

31 日治初期的台灣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日文的掌握在此時仍未成熟。對於大部份傳統知識分子而言，漢文依舊是他們在接觸近代知識以及殖民主的最重要媒介，這也是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面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也可以說漢文版的說話對象首先是台灣傳統文人這一社群。因此此處對於支那觀的討論主要仍聚焦在日日新報的漢文版面上之論述。

32 此處他時化（allochronism）的翻譯是採用藍佩嘉的翻譯。轉引自藍佩嘉、吳伊凡，〈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台灣社會學》22期（2012.09），頁26。文中指出「Allochronism」的概念原本是由Johannes Fabian（1983）所提出，批評人類學家看待研究部落時，傾向將後者放置在一個不同的社會時間（傳統、落後），與人類學者來自的「現代」社會之間的時間關係是不連續的、排他的，從而達成空間上的「距離化」（distancing），以及政治上的「他者化」效果。」

1. 關於晚清的支那論述

從1920年代以前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911）可以看到支那論述伴隨著清末民初的局勢變化而有所對應，在殖民統治初期，強調甲午戰爭做為支那與日本地位關係改變的分水嶺，以此確立在台統治的正當性與優越地位。從甲午到庚子「國愈不振，外患愈逼，西山日薄，旦暮可危，而支那人士或尚以甜以嬉夢」³³標誌的是清國病入膏肓危亡不可就藥的形象。反面刻畫出來的卻是在甲午一役得到勝利，並在庚子拳亂後作為八國聯軍之一員的先進文明國形象。同時也標識了從過去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到以西方科學理性為中心的近代文明秩序的一個轉折點，從過去朝貢藩屬關係到「亞細亞之惡友」、「亞細亞病夫」、「支那者世界最大之骨董也」³⁴的轉變。回到台灣這個日本帝國新附版圖的歷史語境來看的話，這樣的漢文支那論述，除了再度確認了甲午一役馬關條約的國際政治現實之外，也同時進行對清國現勢的再認識。不論是在地理或是權力位置上過去一直以「大陸——邊陲」為座標的台灣，此時透過以全島為範圍的、日本殖民的近代媒體之傳播，日本與西方列強逐漸出現在其視域當中，重構了台灣人對世界與國際秩序的想像，雖然這個世界圖像是經過殖民者揀選再現過的視角。

而1904年發生的日俄戰爭，這場被日本界定為黃種克服白種的戰爭、維護「東洋平和」、「扶弱抑強」的一場戰爭，同時也是與清國「同洲同文同種」、「唇齒輔車」³⁵之日本的勝利。從1905年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以「日俄戰後之日清關係」為題的系列募稿來看，當中對於同種同洲以及保全東亞的不斷被強調，甲午戰後的日清關係被重新架構為亞東大陸（亞洲／東洋）唇齒相依的兄弟之國。當時林仲衡亦曾留下詩作以「我為亞東黃種賀。免教犬馬役非洲。」³⁶來形容這場戰爭。可以看到亞洲／東洋作為視域已逐漸浮現在

33 〈論支那之前途〉，《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2.10.04，4版。

34 大東生，〈支那雜觀（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9.13，3版。

35 論者曾指出：「『輔車唇齒』是中國慣用成語，日文把這複合詞互調為『唇齒輔車』，在這世紀的轉捩期，這寓意豐富的成語被二國在一切問題上廣泛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任達，《新改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09）。

36 林仲衡，〈聞日本占領遼陽感作（1904）〉：「雄師血戰報秦仇。奪取遼陽壯志酬。我為亞東黃種

台灣人的地理想像中，同時也再度確認了在這個不同過往「華夷想像」的「亞洲／東洋想像」當中，日本被描述為一個領導者、保護者的角色。論者曾指出日俄戰爭後，也是「滿洲」³⁷這個原本不相干的遠方走進台灣人日常視域的開始，而透過一系列關於日俄戰爭的戰爭文本在報紙上的大量刊載與重複出現，藉由被閱讀的過程中不論是在行政區域上或是精神上的界限都被「再界限化」於殖民者所勾勒的界限之內，形塑出來的是共享的殖民地空間意識與想像共同體，而同時台灣人的世界版圖也正快速地重新盤整。³⁸

1905-1906年，這個時期是清廷廢除科舉，設立新式學堂以及宣布預備立憲、公佈中央新官制，亦是清末留日學生的高峰，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革命黨開始活躍的時期。而在殖民地台灣，此時則是改隸已屆滿十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³⁹獨立發行之際。這個階段漢文支那論述也到達一波高峰。對於清國的維新與革命，除了透過新聞紙進行實況報導，同時也透過眾多論議評說，持續進行對於清國的他者化與再現。清國的維新被描述為「纔醒長夜之惰眠」⁴⁰之睡獅，「非國民之維新，只紙上之維新」⁴¹而已。清國的革命，則被描述為「如流質然、膠之不黏、如散沙類、層之不累、則聲勢甚渙散

賀。免教犬馬役非洲。秦地關河草木兵。漢朝陵墓鼓鼙聲。傷心舉世無頗牧。坐使神州蠻觸爭。」，〈仲衡詩集〉（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69.12）。

37 不只是滿洲，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得到南滿利權成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外，同時也簽訂日韓協約，在朝鮮設置統監府，宣布朝鮮受其保護，逐步將朝鮮納入日本帝國擴張版圖內。而朝鮮和滿洲一樣，也開始走入台灣人的生活視域，共同構成了某種殖民地空間意識想像的可能性。到了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台灣與朝鮮更成為殖民地的兄弟。

38 詹閔旭，〈滿洲在哪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的滿洲論述與地方認同驅力〉，封德屏總編輯，〈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03）。作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視角，認為除了透過日俄戰爭文本將殖民地的台灣人再界限化於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從屬關係與空間意識之內，同時透過唇齒相依的日清關係強調，俄國作為日清共同的他者，將日本與清朝劃入同一共同體。而後者的亞洲共同體想像縫合了台灣在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的心理切口，重新團結在一個以亞洲為名的共同體想像界限內。筆者在此處比較強調前者殖民地空間意識重塑的再界限化，至於後者關於亞洲共同體的想像是否縫合了台灣人在甲午戰爭被割讓的心理創痛，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述視角有其新意，但卻有所保留，因為這裡的亞洲共同體想像中，存在的是對於清國的輕蔑以及對於負面支那性的描述，這樣的共同體想像中，是縫合了台灣人的傷口抑或再度割裂了台灣人對於前朝舊邦的認同想像是可以進一步再討論的。

3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07.01-1911.11.30。其在1905年的獨立發行，與台灣漢文知識分子對新聞指這個近代媒體的接受度提高與漢文版的讀者增加有所關係。同時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說殖民者要透過報紙閱聽傳達給漢文讀者階層的訊息量增加也有所關係。

40 〈清國維新之趨勢（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2.07，2版。

41 〈清國維新之趨勢（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2.09，2版。

也。」⁴² 維新與革命上的失敗則被歸咎為支那民族「無國家觀念」、「無團結力無自治性」⁴³、「無合群思想、無公德之熱新、各為其私、不尚公憤、不重義務」。⁴⁴

日本則被定位在維新成功的前輩與典範，相較於才剛要覺醒於睡眠昏昏的支那，日本必須擔負起奮興亞洲人的責任，「執東洋之牛耳」，⁴⁵「維持東洋之平和，保護支那之鞏固」，⁴⁶擁護提攜支那人。這裡可以看到日本對於中國的一種「輕蔑與連帶的雙重意識」，⁴⁷同時也某個程度體現了當下歷史語境日清權力結構與關係變化，以及日本如何透過支那形塑近代日本的自我認同與身分。這些關於支那的種種話語言說，除了在新聞紙上，也在教科書中生成、傳播，並伴隨著之後不同的歷史場合而有所衍生與再生產。到了大正南進期，更出現了一系列支那圖書以及觀光遊記等寫作。⁴⁸

而當這些支那觀透過漢文的中介出現在官方新聞紙上，就不單純只是對於支那國民性的話語建構或是日本透過支那這個他者自我認識而已。「我台人的位置何在」這個命題也同時交錯台灣場域中漢文支那論述的言說中。透過負面支那性的描寫，一方面要提醒的是作為新附民的台灣島民，對於殖民政府的文明新政「勿像支那頑陋之徒」、「慎勿沿支那之舊習」。另一方面已「涵濡新政」、「日學維新文明漸啟」的台人的位置也將凌駕於支那人。可以看到殖民話語邏輯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再度界限化台灣人與支那人的差異，一方面則是賦予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今茲之台人。輸入文明。具有權利。則非奴可知。既隸版籍。平等自由。則非清國奴也。⁴⁹

42 〈支那之革命談（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07.30，2版。

43 〈論支那人合羣之缺點〉，《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3.02.06，4版。

44 同註42，〈支那之革命談（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07.30，2版。

45 〈清國之未來（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0.31，2版。

46 少潮，〈論亞洲人奮興之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1.01，9版。

47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30期，頁195。

48 此部分可以參考，小島晉治監修，《中國見聞錄集成》20冊（日本東京都：ゆまに書房，1997.11）。

49 〈我臺人之價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07.08，2版。

可以說在台灣的支那論述除了召喚了「我台人／本島人」的認同位置之外，也蘊含了透過否定面的支那觀（支那舊習／支那國民性）來推行殖民者對於殖民地國民柔順身體的規訓與改造。除了再次區別台灣人與支那人的界限外，又同時蘊含著殖民統治者治理的目的。當接受了這樣的話語框架，也就接收了殖民者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區別化。在漢文支那論述中，殖民者雖然批判的對象是故朝的支那人。但是卻折射出台灣漢文知識分子自我觀看的鏡像以及對自我主體的改造。

這也是為什麼到了1920年代《台灣民報》試圖對這樣的話語框架與邏輯提出顛覆，但當中依舊滲透了殖民支那論述的話語邏輯。不過大體而言，在日本所劃定出來的文明位階下，台人與支那人都是落後於日本的、需要被文明化的野蠻他者。但是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已先於前朝清國踏上通往文明的階梯。但在這個進步／落後、文明／野蠻的單向道文明階梯上，日本永遠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前方。

2. 關於民國的支那論述

1911年辛亥革命則是作為另一個觸發點，觸發了另一波關於支那論述的高峰。這場被形容為「震動全世界之耳目」、「不三月而成，列強稱其國曰不思議之國」的革命，讓日本從外交乃至社會、思想的深層都帶來猛烈的衝擊。⁵⁰明治以來對於清國專制野蠻落後的輕蔑支那觀伴隨著帝制瓦解與中華民國成立，也必須修正。因此日本對外必須回應東亞局勢的新變化，並確保其在東亞地位與利權。而在殖民地則必須壓制台灣因為祖國由專制走到人民共和而浮動的民心。1913年甚至發生了以羅福星為首「冀台灣版圖，重歸支那」，被官方定調為鼓吹革命思想的「苗栗革命陰謀事件」。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可以看到此事件從拘捕、審判到判決執行的報導，除了以事件作為殖民地近代法律的

50 可參考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大陸問題」的構想及其實態〉，《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04）。作者列舉了辛亥革命後由右翼到左翼日本的四種中國認識觀。雖然日本的中國認識觀隨著中國社會變動而自身不斷分裂、解體，但作者認為不管是哪種類型都無法逃脫籠罩在近代日本頭上的近代世界邏輯的巨網，這張網制約了他們觀看中國的視角，未意識到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身分，而依舊延續了明治以來以指導者自居的上位意識。

展示舞台外。當中是如此描述匪徒動機；「彼等唱道台灣人即支那人。無永久屈服日本理由。」，⁵¹而對於事件的處理方針則是：「全島皇化蕈敷之今日。宜加以大鐵鎚。不則一般臣子。徘徊歧路。迷於依歸……」。

對於殖民統治者來說，重新再界線化台灣人與支那人的界線，強化台灣人作為帝國臣民位置有其必要性。因此此時台灣人位置雖然依舊是交錯在漢文支那論述當中的重要命題，但有別於早期強調的是台灣已先於故國踏上文明開化的階梯，此時更加重了天皇與教育敕語的比重，更多是強調台灣作為臣民的義務與責任：

改隸後今日之台人。與改隸前之台人。位置有異乎。曰有異。……故以我台改隸而後。歷任督憲。承明治聖天子同仁一視之深心。……台人今日生活上。殆不見困難者。我天皇陛下之聖明。……學校教育奉教育勅語為主旨。台人之智識。亦逐漸以增。……今則王道蕩蕩。……台人生活上之位置。視改隸前大有過。決無不及。奚可以感情的思想。而忘卻之哉。而況乎我國自日俄戰勝而後。為寰球之一等國。台人一出海外。即受日章旗下一等國民之待遇。競爭奮鬥。視支那人優越數等。台人可不知所報效哉。⁵²

以上可以看到不同於初期對於近代文明的強調，日本大和民族作為殖民母國的各種意象更加濃厚，同時還存在著帝國臣民位置的召喚，以及一個殖民主眼中理想臣民形象的塑造。除了可以在新聞紙上的漢文支那論述看到這樣的轉折外，這個時期在教育上近代化教材的萎縮和日本化要素的提升也反映了這個從「近代文明到日本精神」的轉移過渡。⁵³伴隨著大正南進期，台灣人被視為南進政策中日親善媒介的同時，被期待是以帝國臣民的身分投入，因此對於臣民

51 〈滑稽革命真相〉，《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4.02.19，5版。

52 〈改隸後今日之臺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0.08，1版。

53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陳培豐，〈近代化教材的萎縮和日本化要素的提升〉，《「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這個時期陳培豐認為不同於早期「同化於文明」的同化教育方針，明治後期到大正時期，出現了「同化於民族」的修正與調整。

身分的塑造也成了這個時期的重點工作之一。

在這樣的支那論述中，本島人／台灣人的認同位置在這樣的時勢推移下，也就逐漸開始與支那人錯開，是不是可以說「台人／本島人」的認同形構便是在這個日本人與支那人的界線畫分中被產製出來的歷史產物（被召喚出來的主體位置）。而透過支那論述區隔出來的台人／支那人／日人的界限而隨著中日關係的變化恆常地處在變動之中必須不斷地重新穩固。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支那論述是因應著中日兩國關係的變化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而不斷回應與再生產的。

而對於支那負面意涵表徵的翻轉一直等到1920年代《台灣民報》上才提出對於支那一詞的使用的警覺、批判與拒絕。但是即便是謝春木的《新興中國見聞記》也是不自覺地混用了支那與中華來指稱其心目中的新中國，也可以看到台灣人的中國認識的錯雜。更遑論日治中後期以後，日語世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從教科書中得到的中國認識。⁵⁴ 支那做為一個時代生產下的文化名詞還是浸透在知識分子觀看中國的視角當中。如果中國知識分子透過日本的支那觀折射出自我的形象，那麼而夾處在中日之間的台灣人的自畫像是否更為分裂與破碎？

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又是如何接收這樣一個關於故國、前朝的支那形象呢？從故國到支那到民國之間傳統文人的反應又是如何？以下希望透過日治初期其西渡中國的書寫進行爬梳，在西渡的移動經驗與書寫中，對於移動者與閱讀者而言，是否都是一個磋商界線與重新圖繪台灣人在改隸後的版圖與疆界的過程。改隸後，這群漢文知識分子投射到故國前朝的目光是否有了改變，這個目光的凝視又是如何反射回到其自我觀看的方式，殖民者的支那觀形塑是否也交織在這個投向對岸的視線當中。都是以下對於西渡書寫希望觀察的。

54 吳濁流在〈南京雜感〉曾提到：「對於南京的關心，是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的事。在這之前，因不曾有過交涉，所以連究竟是怎樣的所在，都不曾去想過。對中國——自己的祖國——也是一樣的。依日本教科書的教育：鄰國是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敗的國家，外患內憂無常的國家。雖然曾想去看個究竟，由於沒有機會，學生時代彎曲的觀念，無法拔除，一直懷抱在心中。」，引自吳濁流著，張良澤主編，《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51。

三、作為一種共同體想像的耳目閱讀出發與歸來：臺日報上的西渡遊記與送行詩文當中的文化身分地理

移動性是活歷的關係（lived relation）；移動性乃是對個人自身，對其他人，以及對世界的定位。……移動性是一種跟世界產生關聯、參與，並在分析上理解世界的方式。⁵⁵

觀察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台灣漢文知識分子的西渡經驗，以下藉由兩個部分進行耙梳，一是間接的送行詩文以及和韻贈答作品，二則是直接的遊記與吟草。漢詩專欄雖然往往只佔新聞紙版面的小角落，但卻提供了一個以全島為範圍的、持續固定的近代媒體空間給予漢文知識分子。論者曾指出這種刊出文人社群互相唱酬贈答的固定開放空間，不僅有助於爭取認同，同時也形成共有的文化議題與參與感。⁵⁶而在專欄中刊載過為數不少的送別詩文，其實也在形塑著某種共同議題與參與感。透過文人足跡的移動，更是重新描繪拓展著台灣之外的地理空間與世界圖像。殖民地的交通與電信網絡等現代建設勢必改變了漢文傳統知識分子的空間感與時間感，移動帶來的不儘是身體的也是空間的感覺變化。定期的輪船航班讓移動的可能性與路線更加頻繁錯綜。而殖民地電信機關的擴延，「郵筒」做為一個新的喻像頻繁出現在詩文當中，隔海唱酬抒發胸臆也成為了可能。從移動當中，不管是身體的還是紙上的漫遊，連綴出來的是一個傳統漢文文學空間與漢文知識階層世界觀／感覺結構的改變與再生產。以下便由日治初期西渡大陸的送別詩文與遊記遊草切入討論西渡書寫的文化語境以及文化身分地理。

（一）啟程之前：西渡送別詩文當中的中國想像與自我位置投射

新的流動版圖其實鋪陳了由外窺內的目光調整。……個體目光的調整，

55 彼得·艾迪，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9），頁xviii。

56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11），頁188。

其實是拓展背後的集體視域。⁵⁷

送別詩一直是古典詩歌傳統當中一個重要類別，不管是即將出發抑或送別的，兩方都在詩文當中交換著對目的地的空間想像以及對於旅行壯遊的自我期許。日治初期的西渡送別詩文，雖延續了古典詩歌傳統中祖餞詩酒送別的傳統，卻又因為殖民地統治而投入了變因。不管是物質上的印刷資本主義乃至交通郵便電信等現代性建設，或是文化身分上面對過往故國舊邦的目的地，抑或是在官方日支親善政策下的移動路徑，都交疊出更為複雜的空間想像與自我認識。

西渡詩文出現在《台日報》的時間較東遊相對來的晚，這是因為東遊詩文背後有其眼目教化、確立日台文明位階與殖民關係之目的。而西渡詩文除了在領台初期官方對於與對岸僅隔一衣帶水，為土匪之蜂起，與阿片之秘密輸出等原因嚴加取締旅行對岸外，還有阻礙其統治正當性建立的疑慮。因此初期的送別詩文大多是東遊，或是殖民地官員東歸或島內赴任旅行的漢詩唱和作品。一直要到日俄戰爭前後，西渡對岸旅行的詩文遊記才逐漸增加。當中最先出現的是日人的對岸旅行紀錄，如大東生（木下新三郎）1906年連載的《清韓漫遊所見》與《支那雜觀》，1907年梅法學博士講演的《清國旅行談》等。到了1907年2月謝介石出發前往吉林赴職；3月李漢如赴廈門辦《全閩日報》；1911年魏清德擔任官方籌組的南清觀光團隨行記者；王少濤赴廈門任旭瀛書院講席；1915年魏清德轉駐廈門閩報館等移動串連一系列西渡送別詩文的生產。這固然與背後帝國的日支親善與南進政策相關，做為「圖南之石」的台灣，官方新聞紙決定了那些移動對岸的路徑值得被看見與被關注。但另一方面隨著官方南支政策觸角的擴展，也連動了旅行對岸的網路，使得私人行旅（不管是旅遊、經商、祭祖、求學、求職等等）的移動也更為活絡，這些都可以一窺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的移動路徑。以下，筆者想藉由一系列匯聚在台日報上的送別詩文

57 高嘉謙，〈時間與詩的流亡：乙未時期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王德威、季進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04），頁8。

來切入觀察當時台灣傳統知識分子在這個殖民近代公共媒體上的酬唱空間，以及送行者 and 啟程者，透過詩文交換了哪些對於行旅目的地的想像。

1902年日本於廈門設置領事館，鼓浪嶼成公共租界，1906年成立台灣公會，1910年成立旭瀛書院，負責台灣籍民教育。廈門可以說是殖民地南支南洋政策的第一個基地，加上與台灣的地緣與親緣性，1910年代前往廈門可以說最為普遍的選擇。1907年在廈門辦《全閩日報》的江蘊和回台返廈時，許梓桑寫了〈全閩新報社長江蘊和返廈舟中有感贈四絕即次前韻竝希郢政〉：

鷺江月色襯流霞。捲起簾籠影上紗。莫悔天涯長作客。詩人到處可為家。
兩地睽違想像中。偶然聚首暢和風。樽前笑語歡無限。話到滄桑感慨同。
誰憑隻手可回天。欲挽狂瀾思不眠。閩地澆風何日化。廣開民智著鞭先。
漫云浪跡潤風塵。艷羨生花筆下春。喚醒同胞增智識。挽回元氣賴誰人。⁵⁸

詩裡描寫對於隔一衣帶水的鷺江，因為睽違多年只能想像或從歸來客口中聽聞故國滄桑。而從隻手回天、力挽狂瀾則可以看到與丘逢甲詩句的互文指涉，這當中除了有對乙未割台的傷痕記憶，但同時又有以文明喚醒同胞啟發民智的期待。而顏雲年〈次全閩新報社長江蘊和君見示瑤韻〉更進一步提到「誰將大力挽頽風。願君好奮生平志。到處維新倡大同。年來黃禍釀滔天。太息金獅尚穩眠。鄰誼亦關唇齒痛。八閩風氣望開先。閱歷滄桑幾劫塵。羈留鷺島已多春。滿腔血向全閩灑。澆醒昏迷醉夢人。」⁵⁹在顏雲年的詩當中，我們可以見到前述梳理的支那論述中當時流行的新聞語彙，將清國譬喻沉睡中的酣獅、醉夢人，以及日支親善政策中的唇齒相依的隱喻。1911年王少濤赴廈門擔任旭瀛書院講席，篁村劉克明以及蘇世昌的送別詩中「鄰國維新仗異才。君膺天爵造樑材。春風有腳渡江去。吹出文明花遍開。」⁶⁰，「教鞭直指思明郡。好喚睡獅

58 許梓桑，〈全閩新報社長江蘊和君返廈舟中有感見贈四絕即次前韻並希郢政〉，《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0.14，1版。

59 顏雲年，〈次全閩新報社長江蘊和君見示瑤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0.15，1版。

60 劉克明，〈送學友王雲滄之鷺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8.29，1版。

為解愁。西風鯤島送征裘。書劍脩然故國游。傳授文明新樂律。望樓家赦重千秋。」⁶¹也有類似的期待，就是將西風與文明花朵／新樂律輸往鄰國協助其維新，為同文同種的鄰邦作育人才。

1915年陪同台日報社長赤石定藏前往福州整頓《閩報》報務的魏清德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期許，同時這次也是日治前期臺日報上最為密集的一次送別唱酬。⁶²之所以會得到如此熱烈的迴響，與台灣總督府以《臺灣日日新報》報社購買的形式將《閩報》收歸為其直轄機關報的背景有關。⁶³當時在報上除了一系列送別詩文外，更前後刊登過三次《閩報》的擴張廣告，宣傳該報「謀親善日支關係。維持東洋平和者」的目的與任務。⁶⁴被稱許為「東瀛名士」的魏清德，被賦予了以木鐸之聲喚醒同胞民智、扮演輸貢文明的進化導師，以文章扶持大雅、喚醒黃種、提唱東亞平和等期許。對於這些前往故國的抱負期許，如果說單純出自於故國之思似乎過於簡化，除了台灣漢文知識分子對於殖民進步現代性帶來的文明觀的接受甚至無意識中接受了殖民論述當中的文明位階。當中頻繁出現的新聞與時局的語彙，如日支親善／善鄰／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等，可以看到在當時官方同文同種的日支親善政策下，藉由唇齒相關、善鄰提攜的隱喻，召喚了一個乙未割讓後故國與新邦之間接合的認同想像位置，縫合了這群漢文知識分子因為割讓而撕裂的認同與文化身分。許俊雅曾指出：

東亞論的存在，使得台灣「新附民」的文化身分在「國體論」中所造成的矛盾可以得以紓解，台灣人民對於中國的想像與認同也得以透過「提攜中國」與「改造中國」的實際作為得到實踐。⁶⁵

在魏清德此行的留別詩文中，從詩友的餞別贈言中可以看到上述這種提攜與

61 蘇世昌，〈送王少濤社友之鷺門即次留別元韵〉，《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9.22，1版。

62 從1915年9月16日到1916年1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都有留別詩文。當中又以9月到10月最為密集。

63 毛章清，〈日本在華報紙《閩報》（1897-1945）考略〉，《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期（2010.02），頁120。

64 〈擴張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5.10.01，6版。

65 許俊雅，〈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台灣文學學報》21期（2012.12），頁31。

改造的想像軌跡：「到是同文同種地，好將親善策朝朝」、⁶⁶「同文同種視同仁，唇齒相依形影親。願囑先生寫白禍。喚醒黃色亞洲人。」、⁶⁷「交鄰原有道，最要意疏通。筆正心先正，文同種亦同。請纓懷壯志，擊楫乘長風。南國依唇齒，平和倡亞東。」⁶⁸等。而從王石鵬的「歐西烽火正紛紛，載筆南遊氣吐雲。得地羨君堪用武，交鄰有道仗斯文。」⁶⁹可以看到此時這個「斯文」其實已不單純是維繫漢文化，同時也是日支親善政策的文化工具。如同游勝冠⁷⁰所說的「同文」做為這個時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享的歷史關鍵詞，的確提供了漢文人一個在殖民體制中安頓自己的政治、文化位置。

此時台灣漢文知識分子在唱酬之間交換了怎樣的故國想像？映照出怎樣的自我位置呢？從「昔為桑梓，今成胡秦」，⁷¹到「今為比鄰國，昔為父母鄉。勿作秦越視，日支結寵光。同文兼同種，衣帶水一方。鼓吹休明事，惟君力贊襄。」，⁷²「君行莫問延平事，興廢而今易感愁」，⁷³「君自南行我欲東，擬遊內地休將身世論窮通。」⁷⁴其實反映出來的是對於故國認同的位移，從「莫問延平事」到「休將身世論窮通」的離別贈言，台灣知識分子開始面對故國新邦轉換的尷尬與矛盾。在夾處之中，自己的位置如何細究安頓，似乎也開始困擾著他們。而「此去閩山多俊士，虛心相待莫相猜」、⁷⁵「逢人莫漫談時局，心事高山好問禪」，⁷⁶這些送別叮嚀也反映台灣人身分位置的曖昧，尤其是對於台灣籍民的反感與不信任，也造成了台灣人與昔日故國的心理距離。儘管如此，在日支親善政策下，對日本國民責任的承擔與對故國同胞文明智識的提攜兩者並不構成矛盾，也因此文化身分上的衝突矛盾在某個程度上被暫時掩飾及

66 林知義，〈送魏潤庵君轉駐福州閩報館〉，《臺灣日日新報》，1915.09.16，6版。

67 黃純青，〈寄贈閩報館魏潤菴社兄〉，《臺灣日日新報》，1915.10.22，6版。

68 顏笏山，〈送潤菴社兄轉任閩報筆政〉，《臺灣日日新報》，1915.12.18，6版。

69 王石鵬，〈送潤庵詞宗轉駐閩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15.09.28，6版。

70 游勝冠，〈同文關係中的台灣漢學及其文化政治意涵——論日治時期漢文人對其文化資本「漢學」的挪用與嫁接〉，《台灣文學研究學報》8期（2009.04），頁275-306。

71 施嘯峰，〈送潤庵生之福州即次達觀樓留別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15.09.17，6版。

72 曾逢辰，〈送魏潤菴之閩中〉，《臺灣日日新報》，1915.10.19，6版。

73 黃贊鈞，〈次少濤社友將赴廈門留別原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8.29，1版。

74 洪以南，〈次少濤社友赴廈門旭瀛書院講席留別謠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8.27，1版。

75 郭滄亭，〈送潤庵君之閩二絕一律〉，《臺灣日日新報》，1915.09.22，6版。

76 顏國年，〈擊鉢吟席上賦送石崖詞友入閩〉，《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15.01.17，3版。

置後延宕了。面對從民國建立後陷入南北伐內部爭鬥的中國，雖然也有禾黍之悲的感傷：「幾家逐鹿南與北，十載閱牆弟與兄」，⁷⁷「勸君漫洒新亭淚，北伐南征已十秋」，⁷⁸「不堪回首看滄田，南起風雲又北燕。蒿目時艱傷久亂，思逢盛治待何年」⁷⁹等喟嘆。但也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鯤溟今已苞桑固，禹域民猶水火驚」，⁸⁰「舊調勿翻亡國韻，新詞欲唱偉人詩」，⁸¹相較於年年兵燹未曾休的故國，而相對安定的台灣；除了故國禾黍的亡國韻，也想唱寫新調。隨著南北伐的內亂動盪以及日本殖民統治走向同化與一視同仁政策的轉向，在痛心感慨之餘，其視線挪開對焦在更遠處的山水名勝文物古蹟。將行旅視為開眼界、添詩料的禹域漫遊，似乎也成為此時期送別詩文的另一種複調，例如「故國神州多勝蹟，好將山水作題看。」，⁸²「文物故邦猶藉藉，定多名勝飽雙眸。」，⁸³「佇看笑囊佳句滿，中華文物筆端生。」。⁸⁴1925年，黃清淵在〈漫遊大陸留別書香院諸詞友竝呈芷香劍泉兩兄〉中「鄉國有親離別去。神州作客暫辭行。也知鯤海終身繫。無那狐丘正首情。」，⁸⁵詩句中可以看到過去移民的故鄉想像已經被台灣所取代，鯤海才是終身所繫的地方，而神州僅是作客而不再是埋骨的故鄉。故國不再只是故國而已，是互相提攜的亞洲善鄰，也是可以縱橫馳騁的新舞台。如同1907年前往吉林的謝介石留別詩所說的：「廿紀舞台堪試演，三千世界任高吟。」，⁸⁶而唱和錢別的黃植亭亦是如此回覆：「從此縱橫新世界，舞台躍上好男兒。」。⁸⁷在這些送別詩文當中，表現出來的是其中國想像的複雜化。

除了臨歧話別之外，對於即將展開的壯遊長征，留別者常以「騰驤好為

77 顏雲年，〈擬遊大陸不果感賦〉，《臺灣日日新報》，1922.09.11，4版。

78 蔡雪溪，〈謹和子珊社兄遊大陸留別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24.12.14，4版。

79 許菊蘭，〈敬和少眉詞長席上即事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23.10.18，4版。

80 林夢梅，〈贈別石崖宗先生〉，《臺灣日日新報》，1923.10.28，6版。

81 釋慶妙，〈留別萃英吟社諸君漫遊大陸感作〉，《臺灣日日新報》，1923.09.01，4版。

82 張晴川，〈寄懷子山詞兄遊大陸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24.12.08，4版。

83 顏雲年，〈次韻送月樵玉書兩先生遊大陸〉，《臺灣日日新報》，1922.09.16，6版。

84 何秀山，〈恭送石崖先生遊大陸即次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23.12.01，6版。

85 黃清淵，〈漫遊大陸留別書香院諸詞友竝呈芷香劍泉兩兄〉，《臺灣日日新報》，1925.04.23，4版。

86 謝介石，〈將赴吉林留別臺陽諸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02.15，1版。

87 黃植亭，〈春中雅集席上送謝介石之吉林得支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02.20，1版。

奮龍駒」⁸⁸「成功待祝在南圖」⁸⁹來祝福，而相對於鵬程展翅、投筆長征、載筆掛帆的意象，則是一系列斫地王郎、名駒伏櫪、蓬茅屈守、齊門吹竽的意象。這些隱喻或意象本就是送別詩常見的主題，但如果進一步置放在殖民地現實語境的話，一方面可以看到官方藉由這些西渡詩文遊記推動帝國的南支南洋政策乃至殖民地人民的南圖之志，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殖民地台灣傳統知識分子的發展空間，除了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阻斷了科舉出仕的道路，伴隨著漢文書房的衰落以及近代殖民教育的深化，一直是不斷受到擠壓的。被留下來的人，也常常有「君以掛冠酬壯志，我慚見獵負幽情」⁹⁰「附驥未能徒健羨，媿余書劍兩無成」⁹¹等喟嘆。可以看到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移動，也因此透過新聞紙上旅行書寫閱讀所構築的集體文化想像也在此「觀光鄰國歸去來，為我言之當歷歷」的過程中。

1920年代也進入台灣人前往中國留學的高峰，新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又是如何在移動的過程中折衝協商文化身分呢？傳統漢文知識分子世代在東亞論的想像中縫合了因割讓而斷裂的身分，而新一批的台灣知識分子又是帶著怎樣的想像前往中國呢？在與中國的遭遇之中又是建構了如何的自我認識與想像？這也是日後筆者想要梳理的面向。

（二）旅行的視線・視線的旅行：西渡遊記中的中國經驗與文化

個人的素養和社會的關懷往往交織在一起，建構成一觀者的凝視（gaze）。而一個景色的成立，更牽涉到多重的權力關係，和各種特殊的社會情境。⁹²

遊記以目睹親聞的筆調以及移動軌跡的紀錄，為台人／吾台／本島讀者

88 柯振飛，〈和新詞兄弟別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1.14，1版。

89 倪炳煌，〈將遊鷺江 於闕悶軒小集留別瀛社諸友 分支韻〉，《臺灣日日新報》，1912.03.09，5版。

90 潤菴，〈次韻送五溪社友遊南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8.26，1版。

91 吳如玉，〈送石崖先生之大陸即依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23.11.25，6版。

92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台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07），頁81。

再現了親身經歷過的中國經驗與中國圖像。這些遊記和交錯於報紙上的支那觀論述又是呈現了怎樣的互文關係？是同調還是異聲？是應和還是反駁？而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與漢文社群其旅行視線又是投射聚焦在哪些面向？透過其視線反映折射出來的又是怎樣的文化地景與文化身分？以下，筆者想藉由下面幾篇日治初期曾經刊載在報紙上的台灣漢文知識分子遊記切入探討：李逸濤的〈鷺門游草〉（1908）⁹³、魏清德的〈南清遊覽紀錄〉（1911）⁹⁴、退庵的〈游滬日記〉（1911）⁹⁵、嘯霞的〈神州遊記〉（1912）⁹⁶、連橫的〈大陸遊記〉（1915）⁹⁷、石崖的〈閩中遊草〉（1915）⁹⁸、魏清德的〈旅閩雜感〉（1916）⁹⁹和王瘦鶴的〈漫遊大陸遊記〉（1923）¹⁰⁰等。李逸濤的〈鷺門游草〉和魏清德的〈南清遊覽紀錄〉中面對是清末的中國社會。而退庵的〈游滬日記〉則是剛好身處於從晚清到民國革命的轉捩點。嘯霞的〈神州遊記〉則是民國共和建立之始，描繪了中國新政的面目。至於連橫的〈大陸遊記〉和魏清德的〈旅閩雜感〉則是目睹了南北爭鬥與袁世凱恢復帝制的民國紛亂。至於王瘦鶴的〈漫遊大陸遊記〉則除了描繪1920年代依然閱牆不息、鸛蚌相爭的中國還側寫了台灣人赴中國留學的熱潮。這些遊記的書寫者，大半具有漢文記者身分。以下，除了從不同面向切入討論外，也希望能觀察在時間軸上是否存在著歷時性的變化痕跡。

1. 觀看故國的視線：從新亭舊淚到「中華民國」

在西渡遊記詩文中，祖國情懷與遺民意識大概是最常被提出來討論

93 李逸濤，〈鷺門游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01.26-02.28，連載九回。

94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1.28-02.22，連載廿二回。

95 退庵，〈游滬日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0.25-11.07，共十回。除第一回題名為〈游滬日記〉外，第二回以後改題為〈旅滬日記〉，在此說明。

96 嘯霞，〈神州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06.28-08.05，共廿回。

97 連橫，〈大陸遊記〉，1915年刊登在《臺南新報》上，詳細刊登時間不詳，本文以《雅堂先生餘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03）的版本作為討論文本。

98 石崖，〈閩中遊草〉，《臺灣日日新報》，1915.03.14-04.23，共九回。

99 魏清德，〈旅閩雜感〉，《臺灣日日新報》，1916.01.29-03.08，共廿八回。

100 王瘦鶴，〈漫遊大陸遊記〉，1923年連載在中部的《台灣新聞》，詳細刊登時間不詳，本文以《瘦鶴詩文集》（新北市：龍文出版社，2011.05）的版本作為討論文本。

的。¹⁰¹但是從晚清到民國，在殖民地統治的框架中，其實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投向對岸的視線是更為複雜的。由其視線折射出來的不單單只是新亭舊淚的遺民啼泣，還有對於新興民國的觀察期許甚至是失望喟嘆。而在官方日支親善政策上，也並非單純的協力，某個程度上甚至有其對於故國／鄰國同胞在文明開化上的提攜與喚醒的責任，雖然這個文明提攜的背後其實無意中肯定了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性邏輯以及文明位階。上述這些複雜位置呈現出來的是構成日治初期台灣知識分子認同的舞台背景，交錯出來的則是隨著日本統治的深化而亦趨矛盾複雜的文化身分地理。而在其移動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其面對故國與新邦之間無法休止的對照想像關係。

李逸濤在〈鷺門游草〉（1908）中，便將其旅行的視線定位在「以甲國人觀乙國事」，並從「一觀他國之社會」來了解「己國秩序之寧否」。在這裡他梭巡於故國與新邦的視線是為了讓讀者明瞭在政府的經營下「我台灣之幸福」。也因此其對於故國的凝視複製了殖民支那論述當中的文明等級觀，將清國視為文明幼稚之時代，不管是衛生還是法制、獄制、官軍都是腐敗與野蠻的，較之乙未之前13年前的台灣更甚。在李逸濤此次十日的廈門「出張」旅行中，未看到故國哀思，更多的則是對於「文明幼稚」「不願自脫于野蠻」的負面觀察。

而1911年初擔任官方籌組的南清觀光團隨行記者的魏清德，其投向廈門的視線則是勾連到了大明遺臣朱成功在此於滿人對抗的歷史。並對照今日洋樓高架上接雲霄的景況，認為要是朱成功看到洋人跋扈的景象，必當憤然而起。廈門作為一個漢文化身分的隱喻，「鄭成功／延平」以及「思明州／思明」作為關鍵字常常可以在詩文中看到。值得注意的是，洋人才是魏清德認為朱成功憤怒的對象，這裡將日本排除在鄭成功的對抗對象之外，某個程度上或許是應和了日支親善政策上日本的提攜角色，而掩蓋了其同樣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中扮演了與西方白人同樣的侵略角色。不過在汕頭觀察到當地巡警的機敏，認為雖然

101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台北：國立編譯館，2006.09）便以文化鄉愁與遺民意識心理說明傳統文人親炙祖國自我追尋的內在心理要素。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無法充分解釋其背後的歧異，但也不能否認祖國情懷的確是其中一個無法忽略的面向。

其國野蠻專制但其巡警並不愚鈍民權也未盡喪。而對於支那古文明，魏清德也是肯定的，不管是在漢學上，母國人的漢學家以支那鴻儒碩彥為師，或是對於指南針、曆法、火藥、活版等古文明的讚嘆。但是不管是漢學或是古文明都是代表過去的光輝，相較於專制野蠻退化至今的清國。魏清德還是作出了以下的結論：

吾儕幸歸新政府治下，幸勿仍守故陋，奮一足而留學內地，且負笈歐美，養高等之學問，為國家有用新附之臣民。嗚呼！台灣隸屬版圖十餘星霜矣，而無一人有高等之學識，為朝廷分參贊之餘勞，與行政之成功成反比例，是皆由人民之不奮發故也，負陛下一視同仁之厚德。政府當路培栽之深思，中夜起思，能無興感？故願與我台人共勉策之。¹⁰²

這樣的視角無寧是與官方支那論述的視角是疊合的，姑且不管是官方的支那論述影響了其旅行的視線抑或是其有意識的回應了官方日支親善政策，這樣的遊記與旅行視角如同公學校教育課本當中的支那形象的建構一樣，是否都開始影響讀者對於支那的想像以及對於殖民近代性的認可。

而當民國共和肇造，此時期旅行視線投射聚焦所在又在哪裡呢？退庵〈游滬日記〉的旅行時間剛好身處於這個轉捩點的歷史現場，他又是帶著怎樣的視線在觀看清國新政與起事的革命黨呢？在上海，退庵對於英租界中的公園清國人不得進入的觀察是：

英租界內，有外人創立公園，規模宏大，其雕琢之美麗，莫能與京。……各國人遊覽皆得自由，獨清國人則概屏絕。聞清人引以為辱，不勝其憤，遂聯眾志，集腋成裘，闢地為園…施設極巧，亦禁外人入覽。嗟乎！國民莫患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清國苟人心不死，由此競爭好勝之心，發憤為雄，擴而充之，事事不居人後，何至貽奴隸之誚？而

102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1.27，1版。

睡獅難遽醒哉！今則雖民氣日盛，惜乎有此自新之民，而鼓之、舞之者尚未得振起之道也。¹⁰³

退庵不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批判外人而是反過來認為清國日盛的民氣用錯方向，尚未找到振起之道。也因此這頭睡獅依舊難醒依舊無法從奴隸之譏誚掙脫。而面對革黨風雲日急清人紛紛進入租界避亂，退庵相比之下更有「吾台為安樂國」的感慨。而上海因為在租界文明政治範圍內，不受清國專制政體干涉所以報界蓬勃言論自由，他也批判了清國對於新報的淡漠與壓制。清國在退庵的視線裡似乎是相對於文明國的他者，租界對於退庵來說更是一個相對於專制政體清國的「文明政治範圍」。在上海途次目睹報館四處發放革黨起事已陷武漢的傳單，親身感受到當時租界中的不安騷動與警戒。而對於清國他似乎不存在著故國遺民情緒，相反地他認為二百餘年專制的清國已失去民心，對於如火燎原般蔓延開來的革命起事，他感受到的是清政府的岌岌可危以及大變動的即將來臨。退庵放棄原本計劃的日本內地觀光之行，在警電益急早晚即將發生變作的風聲鶴唳中，旋即返台結束這趟旅行。

1912年到1916年這四年間，從嘯霞的〈神州遊記〉到連雅堂的〈大陸遊記〉以及石崖的〈閩中遊草〉與魏潤庵的〈旅閩雜感〉則可看到民國初建的景象。那個作為文明他者的專制清國已被民國共和所取代。此時他們旅行的視線又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嘯霞此行是往鷺江祭掃並順遊榕滬蘇杭，更想一見中國新政面目。他眼中的中國新政是百廢待舉，國民對於共和的理解也僅限於大都會。數百年積習，亦非朝夕所能更改，人心也猶搖搖莫定也。但是對於提倡國民捐拒絕外債的國民愛國之心，及其撰刊歌詞、廣派演說團以及編演新劇激發全國響應的國民運動，有著「國民幸甚，同胞幸甚」的想法。而在張園這個清末民初上海最大的市民活動場所，他參加了為提倡國民捐舉行的賽珍大會。看到國民與外國官紳贊助者的盡力周旋，他自慚無技可展，不能為鄰國表一同情。但對於中國此後的前途則是肯定的。相對於前述遊記中對於清國腐敗的負

103 退庵，〈旅滬日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1.07，3版。

面視線，可以看到其投射於民國的視線的確有了變化。但同時其視線的參照點依舊是「試觀歐美各國」、「故凡文明國」，中國固有文明之商學，同農工一樣，嘯霞認為都必須由科學以養成之。

嘯霞聚焦於中國新政的目光是客觀冷冽的，同時「台灣」作為一個場所開始帶來了曖昧性，在由廈門搭成四川號赴上海時，遊記記錄了被買辦以台灣人是外國人要加兩成船租的事件。¹⁰⁴雖然遊記一開始面對中國新政他以外人觀看他國政治來定位此行，但遇到將台灣人視為外國人的中國買辦，他似乎又無法接受這樣的界線畫分。這裡可以看到台灣人身分的曖昧性，不管是透過他者觀看或是自我想像，都開始帶著被夾處在中間的中間性格（in-betweenness），既不是「本國人」，也不是全然的「外國人」。

相對於嘯霞以台灣人身分行走在中國這個地理空間中遇到的曖昧矛盾，連橫在1912年出發將近三年的旅行，以海外華僑以及漢民族身分游走中國的他更為彈性靈巧。其介入中國政治現實的角度與距離也要退庵來得較為深入。他將民國的建立視為漢族從滿族手上克復中原，將滿人視為賤踏中原的夷狄。強調滿漢之分與漢民族本位主義的他，面對民國因而有著「江山歸故主」、「如此江山且歌舞，收將舊淚過新亭」¹⁰⁵的感受。不同於本文討論的其他漢文記者多半保持距離觀察的視線，面對民國連橫採取的是實際的介入，從海外華僑聯合會和華僑選舉會的參與、籌辦上海華僑雜誌到在吉林與日人兒玉多一創立《邊聲》批判袁世凱政府，這樣的介入位置，論者陳室如曾以「弔詭的認同關係」來描述連橫的選擇：

就被殖民者的角色而言，連橫當時身分是日本人，為維護自己對中國共和國的理想，卻必須依附日本勢力打擊中國新政府，不論就其身分歸屬與理念選擇來看，都是一種極為弔詭的認同關係。¹⁰⁶

104 嘯霞，〈神州遊記（八）〉，《臺灣日日新報》，1912.07.07，6版。「余由廈門搭四川號赴上海時，向該買辦沈雨章購票。彼問及住所，余以台灣對。沈曰爾乃外國人，船租當加二成。余與辯論時，適船主來，沈被叱罵乃已。」

105 連橫，〈過新亭〉，《劍花室詩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03），頁5。

106 陳室如，〈日治時期臺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41卷1期（2007.06），頁43。

筆者認為這個階段對於連橫來說或許不存在著弔詭的認同，甚至華僑身分提供了一個契機，提供了連橫往來於中國與日本政權關係的路徑，或者是說一個接合其殖民地台灣與漢文化身分的一個節點。所謂的華僑的身分位置，在台灣內部是無法成立的話語空間，只有在中國這個空間才可能成為身分的選擇之一。¹⁰⁷ 由其大陸遊記當中與其同遊多半是來自南洋的華僑來看，甚至可以說連雅堂這個海外華僑身分是因為民國建立而產生。自連橫開始，1920年代前往中國留學的留學生也大半是以此路徑進入中國。這個華僑身分在日中關係還未因戰爭產生變化之前，確實是接合殖民地台灣與故國中國之間的一個接合點，甚至也可以是日支親善政策的一個著力點。

張隆志曾指出，連橫是以日籍華人和華僑的雙重身分參與祖國政治及文化事務。連橫雖抱持著強烈排滿民族思想和祖國情懷，但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和文人官僚，則似未顯示其殖民反抗與批判日人的企圖。¹⁰⁸ 進一步來說，所謂日籍華人這個由日籍和華人組合的身分語彙也說明不同身分的接合關係（articulation），而前者日籍身分的確影響了連橫觀看後者的視線。其遊記中常常可以見到連橫對於日本近代文明措施的肯定，甚至做為對照於中國的參照點，提出對於華人的批判：

日本者東方之君子國也，幕府之時，士皆佩劍，至今學校當中，人尤尚武；捐軀報國，視為至榮，故能戰強俄而伏之。今中國積弱矣，遠師武靈，近法日本，方足以信民氣，而當於教育勵之。¹⁰⁹

向使戊戌之詔得告成功，則清廷早以立憲，政由國人，雖不能如日本之

107 在這裡台灣華僑指的是1897年5月8日國籍選擇以後由中國前來台灣的中國人，多為華工少部分為華商。如吳文星所言：「台灣華僑係因台灣割讓的特殊背景而產生的。其與台人的分別不再民族或語言、風俗習慣等，而在法律身分與地位。」而由於辛亥革命成功是依靠大量海外華僑的支持，所以《中華民國國籍法》接受同時擁有中華民國國籍與他國國籍的雙重國籍身分，將華僑定義為只要血統上具有華人血緣者，皆為華裔，接受海外華人入籍為中華民國國民。可參考吳文星，《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03）。

108 張隆志，〈文化與國家：連橫與伊能嘉矩的台灣認同與歷史書寫〉，「『非關忠誠？』：辨異與認同的文化與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08.11.19）。

109 連橫，〈大陸遊記〉，《雅堂先生餘集》，頁36。

維新，亦可步彼得之辦法，而漢人革命或可不起。¹¹⁰

上述可以看到連橫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及其尚武精神的正面評價，甚至以東方之君子國稱呼之。同時以日本作為一個文明先進國之比較標準，來觀看中國近代措施，例如公園、鐵橋、博物館等現代硬體。而對於華人，連橫則表露了他對於華人素乏公德、不知國體、無政黨道德的視角，甚至是以「豚尾之奴」來評價尚未斷髮的北人辮髮議員等：

黃浦江畔有西人公園，嚆昔榜其門曰：「華人及犬不許入內。」華人以為辱，而不能憤發，一雪其恥。民軍起，華人乃稍稍入矣。而胡服垂辮者由拒止，華人素乏公德，濫折花卉，阻之宜也。¹¹¹

可以看到民國這個初建的新邦，在推翻專制的滿清政府上得到了連橫的認同。但對於這個新邦新民，連橫雖從未以支那這個帶有負面意涵的名字來指稱，但他對於華人的凝視仍免不了日本支那觀的干擾。

這趟將近三年的行旅，移動在中國古典山水與歷史建築之間，各種民國初建現場紀念碑、紀念物等革命地標，也讓連橫經歷一場民國自身傳統／共同體想像的建構，以及文化政治地景的重塑與改造。從西湖秋風亭畔的秋瑾墓塚到3月29日的黃花祭、雙十節，以及辛亥激戰處的彈痕、烈士流血處，還有各種烈士肖像與革命相關物的陳列展覽等，都可以看到民國建立後，伴隨著政治上的新秩序，中國的地理空間成了革命的再現空間。連橫的遊記呈現了民國初建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地景的變動與重塑，在這樣的空間變化與革命地景的創造中，以海外華僑的身分共享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情感與記憶。

這樣的情感投射到了旅程後半，1913年面對宋教仁遇刺、南北失和、黨爭與討袁等民初政局紛擾而遠遊關外。從「大盜竊國柄，小盜亂市朝。群道

110 同註109，頁46。

111 同註109，頁20。

爭殺人，磨刀破中宵」¹¹²的詩句中可以看到連橫的失望。懷著提劍大陸凌霄壯志啟程的他，1914年在北京清史館提出將華僑入史的建議未果最終失意返台。¹¹³逡巡在故國新邦與家鄉之間的視線，這之間的心境變化以及史家位置的尋找，或許也反映了連橫投注在中國視線當中的複雜與矛盾。在詩文中總是以青山青史為抱負，在此趟行旅欲以華僑身分位置介入中國歷史建構的他最終是受挫的，這與他返回台灣後決意以台灣為史是否存在著相關連性或許也是值得追索的。不管怎樣，連橫的《大陸遊記》的確是日治初期西渡遊記中在移動範圍與行旅時間上還有視角上較為深入廣泛的。

1915年石崖的〈閩中遊草〉，則是一開始便點出了本邦與支那舊邦的相對位置，一個是東洋文明之冠，一個則是西方土耳其，以及台灣的海外位置：

余生長海外……今世之遊者。多於歐美文明之邦。而本邦次之。本邦東洋文明之冠者。於嘗從同學之後。觀光於內地。若夫支那則未也。支那者。吾祖若宗。所與共締造之舊邦也。咸同而後。危機恒伏。共和伊始。亂絲益紛。凌夷不振。如西方土耳其然。吾人北望燕雲。感慨繫之。可不一遊其地乎。¹¹⁴

相較於連橫以華僑身分的介入，石崖的旅行視線則是不斷往返於本邦與舊邦之間，在昔日內地旅行與此次舊邦旅行的對照比較間，石崖經歷的或許是被確認為「他者」的同時又是在確認「他者」的雙向經歷。雖然是祖先舊邦，但卻因為語言的隔閡加上穿著洋服執竹杖，被視為「外國人」排除在中國的界限之

112 連橫，〈秋日游陶然亭，悵然有感〉，《劍花室詩集》，頁25。

113 參考連橫年表，「三年春，自吉林歸北京；夏，章炳麟被幽於北京，時訪請益；嗣「清史館」開館於東華門內，應館長趙爾巽聘為名譽協修。入館供事，得盡閱館中所有台灣建省檔案，抄錄沈葆楨、林拱樞、袁保恆、左宗棠等之奏疏；上書館長，力言清史應增「拓殖志」以述華僑拓殖功績，且願自任纂輯之責；十月間，以臧否人物每與趙爾巽爭執，旋經上海返臺南，再入臺南新報社，於該報發表「大陸遊記」、「大陸詩草」。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年表〉，《臺灣通史》附錄（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1.04）。

114 石崖，〈閩中遊草（一）〉，《臺灣日日新報》，1915.03.14，5版。林佛國（1885-1969）字澤生、耘生，號石崖。台北州文山人士，畢業於師範學校、日本法政大學。歷任公學校訓導、《臺灣日日新報》編輯、臺北州協議會員，著有《長林山房吟草》。黃美娥，〈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台北：台北市文獻會，2003），頁11。

外。原本應該清楚明瞭的漢人身分界限因為語言和衣著而模糊了：

或有望與中，而偷視之。則口喃喃。似詫然訝吾三人為外國人。比視余服裝，又似其邦人。若為何許人。實令人猜不出矣。迄無有以台灣人告之。吾輩語言不通。後聞與夫言。始知之。噫人不出里閤。不讀古今書。何以知天下事哉。然風氣之塞。事情之暗。未有若當地之甚者矣。¹¹⁵

閩越王祠墓……無知牧童數人。賭博於上其。見吾輩至。譁然奔避。是日吾輩穿洋服。執竹杖。彼等共以為外國人。固憚而避也。¹¹⁶

在被誤認為外國人之際，可以看到石崖對於閩人的他者化，將其歸咎為風氣閉塞視界短淺。而在閩越王祠墓所見，將其廢墜頹壞延伸到國家的時勢與支那國民性。另外一方面因為殖民近代教育而習得的日語以及文明觀，卻讓原本的和漢界限因而模糊了。建立在殖民文明論述之上的支那觀，也建構了其將支那他者化的視線：

夫支那人忸怩因循。顧情面。大抵如是。國家至今所以不振者。正坐此耳。¹¹⁷

而況殘破未復之支那乎。國基脆弱。人心渙散。政治弗遍。教育難敷。其需乎宗教之力。抑且十倍於如上文明諸國矣。今也。國人大半。尚酣舊夢。苟藉其從來所拜手稽首之佛教之力。先就信徒。而鼓吹之。而啟發之。而後及於一般上下。則事半功倍。功德無量矣。¹¹⁸

而相較於此行語言造成的感情隔閡，回想起的是當年觀光內地乘長風破萬里浪

115 石崖，〈閩中遊草（五）〉，《臺灣日日新報》，1915.04.09，6版。

116 石崖，〈閩中遊草（九）〉，《臺灣日日新報》，1915.04.23，6版。

117 石崖，〈閩中遊草（四）〉，《臺灣日日新報》，1915.03.21，6版。

118 石崖，〈閩中遊草（八）〉，《臺灣日日新報》，1915.04.21，6版。

的胸襟：「回憶內地當年之遊。語言既通。交通又便者。令人欲效長公赤壁之重遊。不覺勃勃欲捨此而就彼矣」。¹¹⁹ 在觀覽福州湧泉寺與鼓山風景的時候，心中浮現的是日本內地的奈良大佛寺、春日神社以及劍潭的台灣神社。途中所偶遇生計艱困的挑夫販婦，對比於吾台「天府之地」「寶庫之邦」，¹²⁰ 引發其台灣已不可同日而語的感想。而將殖民地台灣美化為天府寶庫的說法，是對於在殖民體制下被剝削壓榨台灣人民的未見。此趟閩中行旅，其投射在支那的旅行視線折射了日本殖民論述當中的支那形象與文明觀，而這個文明視線也干擾甚至改變了他對於殖民地的認識、對他者的界限劃定以及自我觀看位置。

1916年魏清德的〈旅閩雜感〉遊記起始便點出了此行目的在於閩報的擴張，希望有資於日支兩國交誼，並毋忘海外發展。作為官方南進政策下的移動，一開始便是在「帝國南支那經營」的動機下出發的，同時又有「由對岸以觀吾台」以及觀察「支那視前有進步乎」之目的。觀察這篇長達28回、刊登時間超過兩個月的遊記，會發現當中看不到「民國」二字，雖然文中也談論到共和體制、雙十節、以及對於袁世凱帝制派的評論等民國時事，但通篇仍多以「支那」來指稱。刻意忽略「民國」背後的原因為何不得而知，筆者認為除了可能與1915年武裝抗日的西來庵事件有關外。也為了強化日支親善政策中日本作為東洋文明指導者角色，刻意淡化民國成立以來的民眾力量，繼續將中國安置在一個落後野蠻尚待拯救與指導的位置上進行論述。對於民國現狀的批判與貶抑，在另外一方面或許是為了安撫或壓制民國建立後台灣浮動的民心，以及再度確認日本殖民統治與作為東洋代表者的正當性與進步性。可以看到此行負責閩報編務的魏清德，隨著其在帝國南支那經營角色的扮演，其視線視角似乎更加窄化。在〈旅閩雜感〉的最後返台後的魏清德面對鄉人對於支那是否視前進步的疑問，作出以下的回答：

119 同註115。

120 同註114。

或人問潤菴生以支那視前有進步乎。曰有。……今雖敗絮其中。形式上猶尚幾分可表見也。……日本維新以來。流幾許志士仁人赤血。先帝陛下。允文允武。大略雄圖。良相相繼。乘於今日。士之老成練達。猶日以黃白衝突。迫於眉睫。晝夜兼進。若將不逮。非故為杞人之憂天也。支那之進步遲鈍。太不可恃。¹²¹

在魏清德視線之下的光復與共和，依舊處於「東亞黃種民族，受多年專制荼毒，自殺其固有文明」的狀態。而同為東亞黃種民族的位置，日支莠豆相煎，共同面對的是黃白衝突的東洋危機。在這裡東亞黃種民族的指稱取代了漢民族的指稱，在東亞的框架之中將中國、台灣與日本聯繫起來。站在善鄰的立場，魏清德指出日本的尚武精神以及鼓吹國民元氣的武士道是進步遲鈍的支那或將實行的道路。魏清德遊記當中發話的對象主要還是面向台灣人，其旅行的視線是站在官方日支親善政策與文明論述的視點，相對於進步遲鈍的支那，台灣則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文明刺激與皇化恩澤。如同東遊觀光遊記當中的「耳目教化」，在其遊記當中或許呈現了另一個面向的「耳目教化」功能。

不過這種以遊記作為一種耳聞目睹的替代物，隨著1920年代前往中國旅行或是留學的台灣人人數增加，過去藉由官方新聞紙上作為耳目的遊記與支那論述所中介的中國印象也開始受到挑戰與更新。加上《台灣民報》與台灣文化協會在1920年代的出現，過往由官方新聞紙所壟斷的言論也出現了異調。到了王達德1923年的《漫遊大陸日記》便可看到這樣的變化趨勢。此行雖語言不通，但藉由紙筆筆談他展現出與石崖不同的積極介入。雖然王達德的視野依舊受到殖民進步主義邏輯的文明框架所制限，例如相對於中國舊式市街的雜沓不潔，他所聯想到的是本島的市區改正。以及對於在外憂內患中仍酣嬉醉夢之中國國民性的批判。¹²² 不過在南京他所見到的軍容齊整、隊伍堂堂，也打破其過去對於中國軍兵無紀律的印象。他有感而發說：「百聞不如一見，信然」，可以

121 魏清德，〈旅閩雜感（廿七）〉，《臺灣日日新報》，1916.03.07，6版。

122 王達德，《瘦鶴詩文集》，頁152。

看到過往透過官方新聞紙中介的耳目閱讀的確烙印了某種關於中國的刻板印象或者是負面中國性。王達德在行旅中看到對於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籌賑義舉，更讓他有「中華為禮義之邦」的印象。在南京見到畢業自東京明治大學的台灣人蘇樵山奉職於該地省立醫院並任外科部長，此事也讓他有「中國人胸懷豁達，視台灣人如同胞，凡有真學問真技術者。一至該地不愁無優越地位。此固中國人之特色。亦台人之幸也」¹²³的感悟。較之前負面的支那性形象相較起來，他對於中國以及辛亥革命的評價是相對正面的。而與山東學校教授的筆談，談到中國有識階級對台島同胞視若兄弟，若合為一氣以台島同胞為媒介，可藉以舉日華親善之實。但也提到了中國人對於閩南的台灣籍民的惡感，視台人為蛇蠍，惡忌台人。這兩個面向也可以觀察到當時中國人對於台灣人身分的想像與劃界。

遊記中也為有志留學中國的台灣人，分析中國學界狀況。亦提到由於台灣青年會在北京的成立以及准許台人比照華僑辦理，使台灣留學生逐漸增加。而以華僑身分前往中國留學的台人，除了僅隔一衣帶水、生活費低廉的原因外，還有語學發達以及教學開放無差別待遇等原因。過往論者常常將前往中國留學者歸因於對於祖國情感，作為乙未後出生的新世代知識分子，作者在這篇遊記當中提供了更多的面向考察當時台灣人赴中的留學動機。關於此部分尚待進一步的討論。無論如何，藉由日治初期這些西渡詩文的確可以看到其不斷來回梭巡在故國與新邦以及吾台的視線，接下來筆者想觀察在這樣的視線往返中，他們又是如何觀看我邦以及吾台的位置。

2. 我邦／本邦與吾台／本島：國民身分與世界想像・回看我邦／母國的視線

如果說日本近代支那觀是將中國作為一個否定性他者的話，那麼日本便是作為另一端的文明與進步的代表者出現。從上面的詩文遊記爬梳中，可以看到日治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移動其旅行視線不斷地往返於故國、新邦與吾台之間。移動在中國地理空間上，視野當中交錯的卻是中國與日本與台灣空間風景

123 同註122，頁126。

的切換比對，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其空間認識的變化與擴延，從香港太平山公園到台北苗圃圓山、從香港市街燈火到台北稻江夜晚、從江蘇留園到台南吳園、從鼓山湧泉寺到日本奈良大佛寺、從閩中茶店到台灣冰店、從閩地三山座到台北東薈芳、從麻雀戲到角力國技、從閩中鼓山到台灣觀音大屯草山等空間的類比都可以感受到這種空間版圖的拓展。此外，對於空間的命名也反映了這種空間認識的關係變化，例如魏清德以東洋味十足的「黑瀨潮」¹²⁴來指稱清代被稱為「黑水溝」的台灣海峽。以「東洋快活奇男子」¹²⁵來形容台灣公會籍民會長的施範其。而到景點購買「繪葉書」的觀光行為，¹²⁶也反映了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的移動基本上是伴隨著日本殖民政府的觀光體系一起開始的，因此其旅行的視線某種程度上也鑲嵌了殖民者架構的近代文明視野。而東洋作為一個框架新的空間認識，東洋健兒作為一種新身分與自我想像也開始出現。

雖然在西渡詩文遊記的主角是中國，但是日本做為一種文明丈量的刻度也常常出現在其旅行視線中。除此之外，出現在西渡遊記當中的日本人形象雖然不是主軸，但也透露了某些弦外之音。例如林佛國在閩中看到如魚逐隊而來的當地舟人，聯想到的是內地門司的舟人。而從基隆經長崎抵上海的王瘦鶴在特別提到在門司看到「港內運炭之勞工，海上之榜人，及市內之車夫等。皆衣服襤褸。面目黧黑。婦人子女，齊出勞動。余乍見之。幾忘其為內地人。不知內地亦有如是困難者。」這種內地舟人景象之所以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內地人與在台內地人形象上的差別，而這差別是來自於後者在殖民地空間佔據的殖民者特殊地位，前者是階級上的差別，而後者則是種族上以及殖民位置上的差異。而王瘦鶴在描述曲阜警察殷勤指導誠懇親切的樣貌時，也隱晦地批

124 魏清德，詩作〈舟過黑瀨潮流〉，〈南清紀錄附吟草（上）〉：「我聞黑瀨潮。我過黑瀨潮。……黑瀨潮。黑瀨潮。吾告汝。吾聞聖明在世。海不揚波。風不鳴條。汝胡為乎水風相激而喧囂。燃犀不有前溫嶠。誰向龍宮照百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20，1版。

125 魏清德，詩作〈贈施君範其〉，〈南清紀錄附吟草（下之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2.08，1版。

126 同註125，詩作〈重歸汕頭寄弟清壬在醫簣〉，提到他寄繪葉書給其弟。「繪葉書」就是明信片，1900年代在歐洲發明，日治時期傳入台灣，當時稱為「葉書」，而附有圖案或照片的明信片則叫做「繪葉書」。

判了「較之官威赫奔。動輒打人罵人者」的台灣警察。

而在魏清德的兩篇遊記中可以看到較多的日人身影與日台關係，第一次的旅行其參與的是以日人為主的南清旅行團，而第二次的旅居在閩省面對的則是台灣籍民與當地內地僑民之間的隔閡。在第一次的旅行中，和內地人一同參觀稅關，在「嚴禁喧嘩」的告示牌下，因為「喧嘩」在日文當中與中文同文不同義，而製造了一個同文的裂縫與矛盾空間：

稅關之前，懸虎牌二，一書「稅關重地」，一書「嚴禁喧嘩」。一行之內地人，多笑其揭示意義之全無也。蓋內地人有口角及拳鬥者，悉以喧嘩二漢字書之道，故彼咸云此地不可口角拳鬥，他地則可，何欲示民以相爭之道？余為說明，群疑始釋。可見己有不知者，即當詢質。史有闕疑。孔子入太廟每事必問，號稱知禮。萬勿以一朝眼光之銳，而遽下腦力之判斷，毫厘之差，往往千里。虛心人聞之，當未必無參考也。¹²⁷

圍繞在「喧嘩」一字的同文不同義中，除了表現了魏清德做為台灣傳統知識分子以漢學正統性自居的意味，也看到了其對於內地人驕矜姿態的批判。而在第二次的旅居，魏清德描述了在福州的內地僑民組織日本人協會和台灣籍民組織台灣公會之間隔一重膜的情形，並認為內地僑民與台灣籍民皆是陛下赤子，台灣籍民敬愛皇室也不讓內地僑民，奏君代歌舉式張宴的情感發露，即便支那人也深受感動。對於內地僑民愛用日本產物的自困以及競尚奢侈行為也有所批評，並提出台灣籍民與內地僑民的連絡渾融對於南支那之經營的必要性。雖然是在中國的地理空間移動，但是看到的卻是內地僑民與台灣籍民之間的隔閡與在南支經營上隱微的競爭關係。即使在中國這個地理空間，其身分認同的自我想像界線是圍繞內地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出發的。從殖民地台灣空間延伸出去的內地人與台灣人的矛盾與差別化，是隨著帝國的海外擴張一起延伸出去的權力地景。

127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1.17，1版。

不同於連橫在其大陸之旅中想以海外華僑的身分進入中國史的建構，魏清德選擇的則是以殖民地台灣人／新附民／臣民進入帝國的建構，返台後在大正協會¹²⁸新年宴席以委員身分演說的魏清德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傾向。若林正丈觀察1910年代的台灣人與日本統治狀況時曾指出，此時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或許已經開始適應殖民地的近代化，並開始要求在殖民地統治框架中改善待遇。這個階段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投向中國的視線也蘊含了殖民地近代化的文明視線。接下來筆者想針對此時期西渡詩文當中頻繁出現的「衛生」作為一個切入的主題，觀察台灣傳統漢文知識分子是如何帶著衛生現代性的視線去觀看中國，並以此進行重劃自我身分想像疆界的再疆域化的工作。

3. 近代文明及殖民現代性的視線

在西渡遊記詩文中，抵達當地後第一眼映入其視線的同時帶有強烈嗅覺刺激的往往是當地的「衛生」狀況。「衛生」作為一個關鍵字，頻頻出現在其筆下與視線中。而其實這個由日本所創造出來的新名詞「衛生」，經由警察——保甲行政的體制化殖民行政以及近代醫學文明新知識的傳播，在台灣從出現到接納到深化，也只不過是20年間的事情。健康與衛生二詞，自1920年代以後，更成為台灣社會的慣用語。除了以此作為標準檢視自己的生活條件，甚至挪用其中的概念來肯定自我。¹²⁹而在其移動當中，衛生作為身體的近代化以及文明化的表徵也被帶進去了其觀看視線中。在台灣這個殖民地空間經歷過的空間改造經驗更成為他們觀看中國的尺標，例如上下水道設施與市區改正、防疫隔離以及檢黥制度，個人的衛生管理等都出現在其詩文中。尤其是廈門漳泉往往被再現為不文明不衛生不潔的空間與景觀，市街湫隘崎嶇，臭氣薰蒸滯塞：

128 大正協會是以日臺官紳為主、以講演會方式進行交流，以內臺融合為目的組織。根據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臺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為例（1895-1925）〉（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大正協會強調的是以文明知識視為內臺融合的重要因素，透過知識交換作為促進內地人與本島人的關係，甚至有其「裨補統治」的作用。而在大正協會的演講會當中，關於日支親善以及旅遊談到衛生知識都是其中重要的主題。由此來看魏清德的〈旅閩雜感〉更能掌握其書寫背後的脈絡與權力位置。

129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10），頁271-323。

此間道路狹隘。往來絡繹。水溝不通。穢氣壅滯。未與俱化之行人。非掩鼻不可。何怪乎外人一履禹域。而使鄙支那人不知衛生之道。為最不潔者乎。初吾聞之。疑信參半。及今觀之。有甚焉者矣。於是乎市區改正之感。不覺裊觸於中。回憶吾台今日之措施。而相形之。一巧一拙。真有雲泥之判。¹³⁰

這些視覺與嗅覺上的空間描述是曾經被日本殖民者用來形容初到台北城時見到的「支那市城市」類型。¹³¹ 透過這樣的空間比對林佛國深刻地感受到市區改正之後台灣的空間轉化，廈門街景成為一個前現代的景觀，展示的是20年前台灣的前現代景觀，而殖民地台灣則是一個改造過後的現代文明空間景觀展示：整潔、明亮秩序以及寬敞筆直。同時從身體上的不潔與不知衛生之道，轉變為珍重衛生的文明國民。莊鶴如曾經寫過〈市區改正還鄉有感〉描述了在新道路的縱橫下過往城郭風景的切割毀壞，表達了對於故園空間上的劇烈變化以及心理上的懷舊與感傷：

故園風景異常哉。甲乙縱橫道路開。竹城市區改正路分甲乙丙三種大者為甲小者為乙丙次之
半壁河山新境界。四圍煙樹舊樓台。菊松尚在荒三徑。親友飄零悶幾回。遊子歸來無限恨。椿彫萱萎不剩衰。觸目參差認不真。拱辰門外悵迷津。依稀尚記東鄰宅。髣髴還疑北里賓。城郭已非前日景。燕鶯仍戀故園春。十年興廢知多少。道路康莊煥一新。¹³²

而賴和也曾經描寫過在防疫過程中由警察貫徹到保甲的殖民體制權力運作：

瘡疾將防遏。隨成竹樹災。警官監督下。保甲動員來。

130 石崖，〈閩中遊草（五）〉，《臺灣日日新報》，1915.04.09，6版。（底線為筆者所加）

131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09），頁174。

132 莊鶴如，〈市區改正還鄉有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6.22，1版。

哪知工竣後。罹病更加倍。祇為千年計。犧牲也合該。¹³³

這些朝向近代空間轉化過程中的殖民暴力，在其敘述當中是看不到的（這樣的殖民行政暴力到了1930年代楊逵的〈模範村〉也依舊存在），也看不到在殖民地台灣的市區改正與公共衛生規劃背後區分本島人與內地人居住區域的那條差別化界線（這種差別化的殖民景觀到了1930年代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仍可以看見）。也因此在其筆下也就看不到中國租界地與殖民地香港的種族與權力界限部署，在對於近代文明與衛生現代性的價值認同之下，反過來再確認了支那人的不潔與落後以及肯定了台灣的公共衛生的進步與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衛生之道不一。有公共衛生。有個人衛生。公共衛生。全憑當道之力。個人衛生。僅賴自身之力。憑當道之力者。共享無疆之福。賴自身之力者。恆遭不測之禍。如百斯篤一種。始自印度。蔓延於香港廈門旋及台灣。我當道對於斯病。如臨大敵。唯恐禦之不力。防之無策。一患者出。必嚴行消毒。極力撲殺。如對岸各地。此病纏綿。十年相繼不絕。……上海各租界。則寥寥罕見。故該地之傳染病極少。道路之整理。可為全中國無以匹敵。……廣闊平坦。塵埃不染。¹³⁴

這不只是影響了他們對外公共空間上的觀看視線，也影響了對內自我衛生管理與身體上的視線，具體表現在對於細菌的「看見」上，肉眼其實看不見的細菌透過傳染病等近代衛生知識出現在視線當中，從肺癆百斯篤虎列刺到花柳病的黴毒等近代醫學病名，以及將可見的不潔污穢與看不見的細菌連結起來，一個受到科學理性話語所馴化的近代身體也就出現了：

吾人旅閩中最為厭惡之處有四。一為市上之惡臭。二為飼狗之橫行。三為肩輿之轎閘。四為喝熱酒。……轎夫執轎閘立於街衢。客至則以轎閘

133 賴和著，〈田園雜詩〉，陳建忠選注，《賴和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頁207-208。

134 嘯霞，〈神州遊記（六）〉，《臺灣日日新報》，1912.07.28，6版。

付客。良久偕其夥伴。昇肩輿至。吾人試思那轎間。為不○轎夫及千百萬人所執之轎間。難保其不無多數病菌託宿其間。因而慄然。……喝熱酒無論賓主藝娼妓所飲之酒。大冶一爐。稍冷之時。則履傾其餘於錫瓶中。又復斟出。則其饒涎渣滓名士之唾餘。美人之○澤。病夫之穢氣。無不兼而有之。是則酒筵上之世界大同者。¹³⁵

而隨著殖民地官方的檢疫隔離、種痘規則以及檢黥制度將個人的疾病納入治理後，對於因花柳病造成的不孕降低以及小兒死亡率的減少等具體健康狀況的改善，更將個人的身體更與國家連結在一起，成為「衛生上的帝國國民」。¹³⁶即使這些公共衛生政策是在殖民行政暴力以及殖民文明優越性下推動的，都被視為一種進步與幸福：

傳染。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又甚於肺癆百斯篤等。而人不知之也。若輩以吾行使人斬嗣絕後。不有當局取締。設檢黥制度。則支那民族之四億。不可得而長保也。吾人因有感乎台灣人口政策。自種痘規則實施以來。小兒之死亡率。非常減少。近復有肺病治療院施設。…曩者中南部奮大英斷。對本島人藝娼妓檢黥實施。其帶有危險性者。則使之入院醫療。此事有功於台灣人口極多。足以證明台灣住民之多福也。¹³⁷

在「衛生」的文明視線下，不潔的支那身體也就成了其種族衰弱不振之原因。甚至「衛生」反過來成為一種文化表述與權力話語，魏清德便曾將「行血清之注射」、「用鹽水注射」等從近代醫學語言拿來做為救國救民的隱喻。¹³⁸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現代醫學之所以有強大的意識形態正當化作用和形塑身分認同的力量，不僅在預防與治療的能力，以及其在帝國擴張過程中的重要角

135 魏清德，〈旅閩雜感（廿一）〉，《臺灣日日新報》，1916.02.27，6版。（底線為筆者所加）

136 羅美雲，〈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0），頁272。

137 魏清德，〈旅閩雜感（二十）〉，《臺灣日日新報》，1916.02.25，6版。

138 魏清德，〈旅閩雜感（八）〉，《臺灣日日新報》，1916.02.09，6版。以及〈旅閩雜感（十三）〉，《臺灣日日新報》，1916.02.16，6版。

色。¹³⁹而接受了衛生之道與近代醫學知識的台灣知識分子，也無意識地接受了科學論述背後的權力支配關係，甚至在透過這樣的視線旅行移動中，間接參與了帝國在中國的擴張。不管怎樣，這樣的觀看邏輯背後，不潔的支那空間隱喻的是20年前改隸前的台灣舊景觀。在身體在空間移動的同時，也經歷了一場時間的往返穿梭之旅，在新與舊、進步與落後、現代和傳統之間移動的旅行。透過空間的差異化，再度確認了自我與他者的位置。而旅行視線的終點隨著旅行的回返也回到了台灣知識分子地方感所繫之位置也就是台灣。

4. 在觀看他者的視線中照見自己：吾台／本島／我台人

不管是出發還是回程，伴隨著輪船的機輪鼓動聲，映入其眼簾的都是台灣故鄉山嶼的送迎，在其筆下都描繪過出港以及入港時回望的在白浪起伏間漸遠或漸近的青山稜線。而隨著殖民地近代實測地圖的出現，不同於過去清代山水畫法地圖的流通有限以及不夠精準的絕對位置，日治時期進入近代地圖時代的台灣，不僅比例精準同時大多公開發行。1904年完成二萬分一地形圖，1906年由臺灣日日新報出版。¹⁴⁰過去一般人無法看到的地圖透過公開發行與教育向殖民地台灣人展開，同時也形塑了其想像台灣與世界的視點。而對於空間的重新命名與安排也重塑了其空間認識。例如1897年天皇對於新高山的「御命名」並藉由近代測量技術確認的「東瀛第一峰」，透過將富士山與新高山的連結，重新建構了由日本內地延伸到殖民地台灣的空間想像與空間權力關係。¹⁴¹1911年，魏清德筆下淡水港看到的山脈蜿蜒，從大屯山、紗帽山到新高山的指認，雖然事實上從淡水港應該是無法看到新高山，但在這樣的指認中

139 李尚人，〈導言〉，《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10），頁11。

140 林惠娟、許嘉贊，〈第三章 台灣地圖繪製發展與演進過程〉，《台灣地圖一百年繪製與典藏發展史》（台北：南天書局，2011.10）。

141 試舉例如下，〈新高山頂祝天長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1.12，2版，將新高山與富士山連結起來：「新高山即玉山也。是名為皇上所御賜者。其高稱為帝國第一。其形雖非如富士山。有白扉倒懸之秀麗。然亦為本島之重鎮也。」

而在1909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9月8.10.11.12日連續刊登羅山吟社以新高山為題的詩卷。1910年的文官普通試驗題目也出現考題：「新高山高一萬三千七十五尺。富士山高三千七百七十七米突。兩山高低如何差幾尺。（但一米突三尺三寸）」。都可以看出透過兩座山脈的連結將母國與殖民地連結起來的空間觀看邏輯。

顯示了其「觀看空間的知識典範轉變」，¹⁴²也就是台灣人的自我觀看與自我想像方式的改變。而到了1916年在魏清德的〈旅閩雜感〉當中，台灣更從具體的空間進一步轉變成一種自我身分想像的空間：

吾人側身由對岸以觀吾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煙鬟幾點。螺髮數峯。
出沒於層波疊浪之間。若近若遙。若斷若續。其為大屯觀音新高合歡雪
山秀姑巒乎。地勢則夫牙錯雜。火成水成諸岩層。隨閩東江走而入於
海。由地文學發見原則之作用。越台灣海峽。與我西海岸相為聯絡。成
蕉葉幅員。其住民則固閩省轄下漳泉兩處移民。其體中曾經遺傳朱明末
季成功一派之忠義血性。及富有安克撒遜人種之冒險優為氣魄。¹⁴³

正因為離開過台灣，才有了這樣一個回望本島的距離與空間想像。魏清德從榕垣想像回望台灣，雖然其實從榕垣是無法看到台灣的。而魏潤菴想像出來的地景，由閩東的江河到台灣海峽到西海岸，從北部的大屯觀音到中部的新高合歡雪山秀姑巒。這裡的文化地理既將閩東江之水透過海連結到台灣的西海岸，同時又鑄鑄了日本近代殖民地地圖對於台灣山岳的命名以及近代地理學關於構成台灣山脈岩層的知識。而從鄭成功到安克撒遜人種延伸而來的關於忠義與冒險的血緣想像，也是交錯著漢民族身分以及殖民近代人種學的分類。可以看到魏清德的自我文化身分想像中，以台灣為載體鑄鑄了兩種不同的知識系譜與空間認識。一是過往以大陸為中心的地理想像與漢民族身分，一是透過殖民知識建構的台灣山脈地圖以及人種的分類。雖然緊接著上述雙軌交織的文化地理描繪後，魏清德接下來還是回到了殖民地台灣的新附民身分：

二十年前台灣社會之組織。文物衣冠之制度。依然為閩省分身。而今已
矣。浩浩蕩蕩。世界文明之思想潮流。若促吾台進步。濡染刺戟。曾幾
何時。而舊時之固陋。淘汰半盡。此吾人之所賀也。南方之強。寬柔以

142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頁208-216。

143 魏清德，〈旅閩雜感（十五）〉，《臺灣日日新報》，1916.02.19，6版。

教。不報無道。太陽直射溫度之昂升。發為熱帶的富有恩澤。西哲論南方之民。偷懶成性。而其文明之所接觸。亦足以使人退化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是故精神文明。肉體野蠻。西人之教育方針如是。¹⁴⁴

強調的是今日的台灣已不同於20年前為閩省分身的台灣，不同於過往先祖東渡而來作為福建東方邊陲的台灣，而之間最大的差別便是世界文明的潮流帶來的進步與精神刺激。同時在引文中可以看到南方／熱帶的位置與空間想像的出現，這樣的文明／野蠻的空間想像背後其實是對於殖民進步主義邏輯的認同。魏清德從台灣空間開展開來的台灣身分想像，同時鑄鑄了漢文化身分與帝國新附民的想像，但同時又感受到對於殖民者所代表的進步文明價值的折服與認同，甚至滲透重組成為其自我表述的語彙與觀看他者的視線。雖然這個位置無法稱之為台灣人的主體位置，而是外在殖民現實所構造出來的殖民地空間。但這個空間的出現，卻提供了一個思考與對照的立足點。像一顆種子在日後逐漸萌芽成台灣人的在地感與自我想像，雖然這個想像總是與殖民者的空間權力部署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繫。

四、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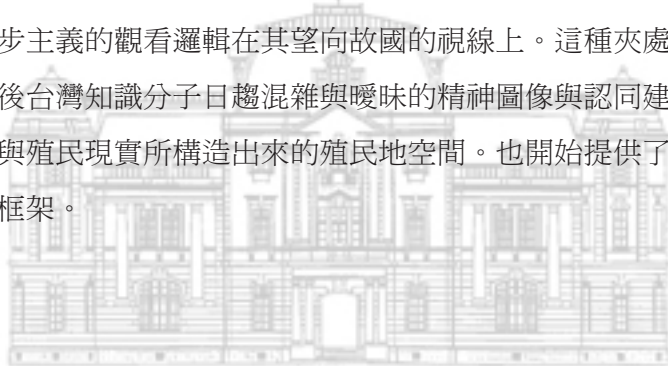
認同的過程是在時間中發生，而且是向前前進的。推翻舊認同，建立新認同，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時間回應政治現實的改變。同樣地，地緣政治也改變了人們對空間的概念，在與地方緊密相關的關係中，透過表述實踐，展開不同的時空交涉與協商。¹⁴⁵

本文花了相當篇幅梳理了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西渡詩文，從移動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條件的梳理，到《臺灣日日新報》上

¹⁴⁴ 同註143。

¹⁴⁵ 史書美，蔡建鑫校訂，《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4），頁64。

支那論述形塑了怎樣的觀看支那的視角，以及出發前的西渡送別詩文當中投注了怎樣關於故國的想像，到啟程、出發、回返之後其移動視線的流動與聚焦所在進行文本分析。筆者發現在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西渡遊記，其移動背後的複雜程度或許遠遠超過故國遺民之思，其背後更鑲嵌了帝國在南支的空間擴張以及日治初期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文化身分地理界限的變動。隨著乙未割台，殖民地做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不管是對內或是對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的重劃。而做為日治前其台灣漢文知識分子也同時經歷了空間與界限的改造與內外的重組。因此在其西渡遊記詩文當中，筆者看到的是這個最早迎受殖民地統治與近代化歷程的世代，在其西渡的移動過程中，在其目光來回梭巡之際，既折服於帝國展示的文明圖景，又失望於故國的動盪衰敗，同時又感受到台灣人身分的曖昧性。透過其旅行視線的交錯，筆者在其西渡中國的移動路徑上，看到比故國情懷更為複雜曖昧的文化身分地理的變動，他們一方面在東亞論以及日支提携親善政策中找到介入點，縫合因割讓而斷裂的文化身分與記憶的傷痕。但同時隨著殖民的深化其對於現代性與近代文明渴望，卻也讓他們複製了殖民進步主義的觀看邏輯在其望向故國的視線上。這種夾處於中間的兩面性也造成日後台灣知識分子日趨混雜與曖昧的精神圖像與認同建構。而台灣做為一個割讓與殖民現實所構造出來的殖民地空間。也開始提供了其思考與行動的立足點與框架。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子安宣邦，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09）。

小島晉治監修，《中國見聞錄集成》20冊（日本東京都：ゆまに書房，1997.11）。

中村孝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04）。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03）。

王達德，《瘦鶴詩文集》（新北市：龍文出版社，2011.05）。

王德威、季進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中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04）。

史書美，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04）。

——，蔡建鑫校訂，《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4）。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等著，《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12）。

克朗，楊淑華等譯，《文化地理學》（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06）。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03）。

吳密察，《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2）。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11）。

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10）。

彼得·艾迪，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9）。

林仲衡，《仲衡詩集》（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69.12）。

封德屏總編輯，《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03）。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9.05)。

洪繹，林文龍編，《八州遊記——洪棄生全集》（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3.05）。

淺野豐美，《帝國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8.02）。

若林正丈，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2007.03）。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4.06）。

張良澤主編，《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6.09）。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03）。

許秦蓁，《摩登·上海·新感覺——劉呐鷗（1905-1940）》（台北：秀威資訊公司，2008.02）。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1.04）。

——，《雅堂先生餘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03）。

——，《劍花室詩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03）。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04）。

陳建忠選注，《賴和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

黃美娥編，《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5）。

鄭曦原編著，《共和十年：《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1911-1921）》（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11）。

薛化元、若林正丈、松永正義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12）。

韓國台灣比較文化研究會，《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

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3）。

羅芙雲，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0）。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09）。

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台北：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07）。

Reynolds, Douglas R.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09）。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中村孝志，卞鳳奎、李玉珍譯，〈台灣和「南支・南洋」〉，《臺北文獻》128期（1999.06），頁231-258。

毛章清，〈日本在華報紙《閩報》（1897-1945）考略〉，《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02），頁121-127。

許俊雅，〈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台灣文學學報》21期（2012.12），頁1-35。

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運動——在「滿洲」的台灣醫生〉，《台灣史研究》11卷2期（2004.12），頁1-75。

陳室如，〈日治時期臺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41卷1期（2007.04），頁33-50。

游勝冠，〈同文關係中的台灣漢學及其文化政治意涵——論日治時期漢文人對其文化資本「漢學」的挪用與嫁接〉，《台灣文學研究學報》8期（2009.04），頁275-306。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30期（2002.12），頁183-206。

藍佩嘉、吳伊凡，〈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台灣社會學》22期（2011.12），頁1-57。

（二）學位論文

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臺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為例（1895-1925）〉

（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三）研討會論文

張隆志，〈文化與國家：連橫與伊能嘉矩的台灣認同與歷史書寫〉，「『非關忠誠？』：辨異與認同的文化與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08.11）。

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初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東遊經驗初探——以1920年代以前《臺灣日日新報》的東遊書寫為探討對象〉，「2008年清成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主辦，2008.12）。

三、報紙文獻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台灣民報》

四、電子媒體

Ayelet Shachar著，陳昭如譯，〈國籍的法律規制與性別不平等——一個歷史觀點的檢視〉（來源：<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13860/1/932413H002030.pdf>，2005）。

